

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

譚其驤

明太祖元元年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覈其所部兵五千人爲衛，衛設指揮，千人爲千戶所，所設千戶，衛所之建始此。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於是邊腹內外，衛所棊置矣。洪武七年申定其制，每衛設前後中左右五千戶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小旗十。軍士皆世籍，官撥牛田，平居舉屯以自給；遇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旣旋，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之遺意焉。

衛所初並隸於大都督府。洪武三年，始建杭州，江西，燕山，青州，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八都衛，分統浙江，江西，北平等各行省境內之衛所。四年，增置成都，廣東，定遠，建寧，大同五都衛及西安行都衛。行都衛者，與行省不同治所之都衛也。（時陝西舊西安都衛並治西安，又別於河州設都衛，故曰行。）六年，又置廣西都衛。七年，又置福州都衛。八年十月，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行都衛

爲行都指揮使司：曰浙江（舊杭州），江西，北平（舊燕山），山東（舊青州），河南，陝西（舊西安），山西（舊太原），湖廣（舊武昌），四川（舊成都），廣東，廣西，福建，遼東（舊定遠），福建行（舊建寧），山西行（舊大同），陝西行（舊西安行）。天下衛所分統於各都司及行都司，惟中書省境內衛所直隸大都督府。十三年，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因以直隸諸衛所隸中軍都督府。十四年，置中都留守司統鳳陽等衛。十五年，置雲南貴州二都司。二十年，置大寧都司。二十一年，改爲北平行都司。二十七年，增置四川行都司。永樂元年，罷北平都司，所屬衛所設直隸行後軍都督府。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宣德五年，增置萬全都司。成化十二年，增置湖廣行都司。嘉靖十八年，置興都留守司統顯陵等衛。自是而後，天下除南北二直隸區外，凡有都司十六，行都司五，留守司二，遂爲有明一代定制。

衛所以在京在外而有內外之別，內衛所品秩崇於外衛所。京衛中有上直衛親軍指揮使司二十六，不隸五軍都督府。又有非親軍而不隸五府者衛十五，武功，永清，彭城

及諸陵衛所二。奠靖，犧牲。隸於都督府者，留守左等衛三十三，牧馬蕃牧二所。南京衛中親軍不隸五府者衛十七所一，又分隸五府者衛三十二所一（並聽中府節制）。外衛所中有爲軍民司者，兼理軍民政務，職位較崇，洪武二十三年置於邊地不設州縣之處。又有王府護衛，洪武五年置，每府設三護衛；王府儀衛司，洪武三年置，掌侍衛儀仗，品秩比千戶所。衛領千戶所以左右中前後五所爲常制，或有不正五所者，則以左左，中中，中前等爲名。又有守禦千戶所，獨駐一地，以守禦某地爲名，直隸於都司，然亦有隸於衛者。又有屯田千戶所，羣牧千戶所，則以其以農牧爲重，異於常所，品秩比守禦所。萬曆初內外衛凡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二十五；又土官之隸於都司衛所者，宣慰使司二，招討使司一，宣撫司六，安撫司十七，長官司六十四。（萬曆重修會典）

永樂元年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後又分爲五府，稱行在五軍都督府。十八年，除行在字，在應天者加南京字。自後天下都司衛所除親軍等衛外，並隸於北京五府；南京五府領南京諸衛所，而仍各以其方隸於北京五府。

左軍都督府在京領留守左等衛，在外領浙江，遼東，山

東三都司。

右軍都督府在京領留守右等衛，在外領陝西，四川，廣西，雲南，貴州五都司，陝西，四川二行都司及直隸宣州衛。

中軍都督府在京領留守中等衛，在外領河南都司，中都留守司及南直隸區內諸衛所，又直隸沂州等衛，汝寧等所。

前軍都督府在京領留守前等衛，在外領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四都司，湖廣，福建二行都司，興都留守司及直隸九江衛。

後軍都督府在京領留守後等衛，在外領大寧，萬全，山西三都司，山西行都司及北直隸區內諸衛所，又直隸德州等衛，武定等所。

二

置衛所以統轄軍伍，設都司以掌一方兵政，其初本與地方區劃不相關。洪武初或罷廢邊境州縣，即以州縣之任責諸都司衛所；後復循此例，置都司衛所於未嘗設州縣之地；於是此種都司衛所遂兼理軍民政，而成爲地方區劃矣。（明史地理志稱此種衛所爲實土衛所，附見於各布政司下；無實土

者不載，以其與地理無涉也。）

今按都司十六，其中遼東都司全係實土；萬全都司大半係實土；大寧都司初治元大寧路，皆實土，永樂元年内徙僑治保定府，所轄衛所並僑治直隸境內各州縣，遂無實土。此外山東等十三省都司，所轄衛所大率即設在各該省州縣境內，然陝西，四川，湖廣，雲南，貴州五都司亦領有實土衛所。行都司五，陝四，四川二司係實土，山西，湖廣，福建三司非實土。留守司二，俱無實土。

遼東都司治定遼中衛，領衛二十五，州二。（二統志）

定遼中，左，右，前，後，東寧衛，自在州治遼陽城

海州衛治海州城

蓋州衛治蓋州城

復州衛治復州城

金州衛治金州城

廣寧，廣寧中，左，右衛治廣寧城

義州，廣寧後屯衛治義州城

廣寧中屯，左屯衛治錦州城

廣寧右屯衛治舊閭陽縣臨海鄉

廣寧前屯衛治古瑞州

寧遠衛治曹莊湯池北

瀋陽中衛治瀋陽城

鐵嶺衛治右隰州

三萬，遼海衛，安樂州治開元城

萬全都司治宣府左衛，領衛十五，守禦千戶所四，堡五。內蔚州衛治山西大同府蔚州，延慶左衛治直隸延慶州，永寧衛治延慶州永寧縣，保安左衛治直隸保安州，廣昌守禦所治蔚州廣昌縣，美峪守禦所治保安州境，四衛二所非實土。

宣府左，右，前衛，興和守禦所治宣府城

萬全左衛治元宣平縣

萬全右衛治德勝堡

懷安，保安右衛治元懷安縣

懷來，延慶右衛治元懷來縣

開平衛治獨石堡

龍門衛治元龍門縣

龍門守禦所治李家莊

長安嶺堡

鵬鶚堡

赤城堡

雲州堡

馬營堡

陝西都司領有實土衛九，所二。

寧夏，寧夏前，左屯，右屯衛治元寧夏路

寧夏中衛治元應理州

洮州軍民衛治元洮州

岷州軍民衛治元岷州

河州軍民衛治元河州路

靖虜衛治金保川縣

西固城守禦軍民所屬岷州衛

歸德守禦所治元貴德州屬河州衛

四川都司領有實土衛一，所一；又土官招討使司一，安撫司一；及茂州衛屬長官司三，重慶衛屬宣撫司二。

松潘軍民衛治元松州領千戶一，長官司十七，安撫司四

疊溪守禦軍民所治古翼州領長官司二

天全六番招討司本元六番天全二招討司

思曩日安撫司

湖廣都司領有實土衛一，所一，又土官宣慰使司二；及九谿衛屬安撫司一，鎮遠衛屬長官司一。

施州軍民衛治元施州領宣撫司四，安撫司八，長官司十三，

蠻夷長官司五

大田軍民所屬施州衛，在衛西北三百五十里

永順軍民宣慰使司領州三，長官司六

保靖州軍民宣慰使司領長官司二

雲南都司領有實土衛三，又孟璉，麻里，八寨等長官司。

金甯軍民衛治元永昌府領縣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三

瀾滄軍民衛治元北勝府境領州一

騰衝軍民衛治元騰衝府

貴州都司領有實土衛十一，所二。

普定軍民衛治元普定路

新添軍民衛治元新添葛蠻安撫司領長官司五

平越軍民衛領長官司三

龍里軍民衛領長官司二

都勻軍民衛

安莊衛

清平衛領長官司二

軍節衛

威清衛

平壩衛

安南衛

關索嶺守禦所屬安莊衛

普市守禦所

陝西行都司治甘州左衛，領衛十二，守禦所三。

甘州左，右，中，前，後衛治元甘州路

肅州衛治元肅州路

山丹衛治元山丹州

永昌衛治元永昌路

涼州衛治元西涼州

鎮番衛治小河灘城

莊浪衛以永昌地置

西寧衛治元西寧州

鎮夷守禦所治兔兒關南

古浪守禦所以莊浪衛地置

高臺守禦所治高臺站

四川行都司治建昌衛，領衛六，所七。

建昌，建昌前衛治元建昌路領長官司三

寧番衛治元蘇州

越巂衛領長官司一

鹽井衛治元柏興府

會川衛

禮州守禦後所，中中所，在元禮州境

打冲河守禦中前所

德昌守禦所治元德昌路以上四所屬建昌衛

冕山橋守禦後所治冕山堡屬寧番衛

打冲河守禦中左所屬鹽井衛

迷易守禦所屬會川衛

三

十三省都司所轄衛所，及南北二京之直轄衛所，每有不在本省布司或本直隸區境內者。換言之，即都司與布司，直隸衛所與直隸州縣之區劃，雖大體相同，而不免小有出入。蓋軍政上之設施，事實上有不能與民政設施完全一致者也。

沂州衛直隸中府，按沂州屬山東兗州府。

德州，德州左衛直隸後府，按德州屬山東濟南府。

莒州守禦所直隸中府，按莒州屬山東青州府。

武定守禦所直隸後府，按武定州屬山東濟南府。

寧山衛直隸後府，按衛治山西澤州。

平定守禦所直隸後府，按平定州屬山西太原府。

蒲州守禦所直隸潼關衛，按蒲州屬山西平陽府。

歸德衛直隸中府，按歸德府屬河南。

汝寧守禦所直隸中府，按汝寧府屬河南。

潼關衛直隸中府，按潼關地屬陝西西安府華州。

嘉興守禦中左所直隸蘇州衛，按嘉興府屬浙江。

九江衛直隸前府，按九江府屬江西。

右直隸衛所之不在直隸州縣區內者。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

磁州守禦所隸山西潞州衛，按磁州屬河南彰德府。

右山西衛所之不在山西布司境內者。河南

潁州衛隸河南都司，按潁州屬直隸鳳陽府。

潁上守禦所隸河南都司，按潁上縣屬潁州。

右河南衛所之不在河南布司境內者。南直隸

鎮遠衛隸湖廣都司，按鎮遠府屬貴州。

清浪衛隸湖廣都司，按地屬鎮遠府。

偏橋衛隸湖廣都司，按地屬鎮遠府。

五開衛隸湖廣都司，按衛治貴州黎平府。

銅鼓衛隸湖廣都司，按地屬黎老府湖耳蠻夷長官

司。

黎平守禦所隸湖廣五開衛，按地屬黎平府。

中潮守禦所隸湖廣五開衛，按地屬黎平府洪舟泊里

蠻夷長官司。

新化屯所隸湖廣五開衛，按地屬黎平府新化蠻夷長

官司。

新化亮寨守禦所全上。

隆里守禦所隸湖廣都司，按地屬黎平府隆里蠻夷長

官司。

右湖廣衛所之不在湖廣布司境內者。貴州

永寧衛隸貴州都司，按永寧宣撫司屬四川。

烏撒衛隸貴州都司，按烏撒軍民府屬四川。

赤水衛隸貴州都司，按地屬永寧宣撫司。

摩泥所隸赤水衛，按地屬永寧宣撫司。

阿落密所全上。

白撒所全上。

七星關守禦後所隸貴州畢節衛，按地屬四川烏撒

府。

興隆衛隸貴州都司，按地屬四川播州宣撫司重安長

官司。

黃平守禦所隸貴州都司，按地屬播州宣撫司黃平安

撫司。

烏撒衛後所隸貴州烏撒衛，按地屬雲南霑益州。

右貴州衛所之不在貴州布司境內者。四川，雲南

瞿唐衛屬湖廣行都司，按地屬四川夔州府奉節。

忠州守禦所屬湖廣行都司，按忠州屬四川重慶府。

右湖廣行司所轄衛所之不在湖廣布司境內者。

四川

參考書：明史地理志，職官志，兵志；大明會典；大明一

統志；大明一統文武諸司衙門官制。

行省的意義與演變

鄧嗣禹

通常一般稱的河北省，河南省，山東省，……省字是

也。

什麼意義？又是如何的演變而來？這是本文所欲說明的。

此為因避諱而改『禁中』為『省中』之說。蔡邕之言見獨

考之說文，『省，視也；從眉省，從叀』。甲骨文未

斷卷上頁三（龍翰精舍校刊本）；原文未有『當時避之，故曰

見有省字，金文與『省』為一字。其他省字的意義，見於

省中，今宜改，後遂無復言之者』。第二，謂省為諸公所

經籍箋詁及各種字典的，如省者察也，循也，善也，明

處之地。文選卷六左太冲魏都賦云：

也，占也，廢也，悟也，過也，考校也，以及減省也等

禁臺省中，連闕對廊。（注：李善曰：『魏武集，荀欣

等，均不足以解釋地方區域稱省的意義。

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

地方行政區域之稱省，一般謂始於元，然而行省之

是禁中與省中有別，不是為避諱而改。又第三說，謂『漢

名實始於金。至於省字的意義，却是由尚書省，中書省，

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見唐書

沿訛附會而來的。在漢朝的時候，有尚書，中書；到了魏

卷一八四湯收傳），與前兩說又迥乎不同。此三說中，到底是

晉，便稱之為尚書省，中書省，都是掌握中央政本的機

誰對？周壽昌漢書校補卷三頁二十，對第一說已加以駁

關。這個省字的意義與演變，前人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詰。他說，『文選左思魏都賦『禁臺省中……』，是漢制

第一，謂省即禁署之意。漢書卷六昭帝紀序：

原有『禁』與『省』之別，不自避王『禁』諱始。且昭帝

年八歲，……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

下距元后時甚遠，何以避避『禁』諱。若為班氏追書，則

中。（注：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闕有禁，非

班氏時已在中興後，更何所忌於王氏而必為之避也』。周

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

氏此說，頗有見地。不過避『禁』為『省』之說，出於後

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省察，不可妄

漢蔡邕，同時人伏儼又引用之。到了六朝，顏氏家訓書證

篇復有『何故以省代禁』之問。三輔黃圖卷六雜錄，又說

『漢宮中謂之禁中』，謂宮中門闕有禁。……孝元皇后

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三輔黃圖這部書，雜記

漢京宮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八）說是梁陳間人所作，

程大昌雍錄（卷二）說是唐肅宗以後的人所作。可見唐朝以

前的人都是相信第一說的。魏都賦所述，或為魏制。周壽

昌說昭帝距元后時甚遠。然大致估計，自昭帝宣帝以至元

帝之時，不過四五十年。孝元皇后的父親，是王莽的祖

父，家凡十侯五大司馬（見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王氏紀漢代

史，凡避諱之處當然加以紀錄，不能說他是東漢人，便無

忌於王氏，不必加以追書了。再看程大昌雍錄卷二，在公

車司馬門下，對於禁中省中也有很詳細的說明。他說：

宮垣之內皆有司馬門。……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

馬門』。……自司馬門內，則為『禁中』。孝元皇

后之父名禁，避諱改禁中為『省中』：禁者有所禁

止也，省者有所察也。

從此看來，可見講省字的第一說還是比較可靠。第二說謂

『省』與『禁』為二，不見得確實。第三說楊收所謂『總

羣官而聽曰省』，意義不很明白。以漢代中書尚書的權柄

觀之，楊收雖說是漢制，實際上恐怕是唐朝的制度。因為

尚書中書都是秦朝少府的屬官，漢初沿秦制設立，地位仍

不高。那時國家重要的政治掌於丞相，尚書不過是主天子

的文書。到漢武帝時權任稍重，天子常與議政，於是變為

親要之職。武帝游宴後庭，以尚書為士人，不得出入臥房

之內，乃設中書官，以宦者為之，掌詔詰答表，出入奏

事。中書之權，一時陵駕尚書。以後，這二者迭相上下；

然俱設在禁中，比較丞相易於接近人主，故亦易於掌握實

權。然至後漢時，尚書始為機衡之任；魏晉以後，始稱為

中書省，尚書省，變為真宰相。到了唐朝，以三省秉政：

尚書省總領百官，統會衆務；門下省掌侍從獻替，封駁非

宜；中書省掌獻納制冊，敷揚宣勞。尚書省總領六部，好

像現在的行政院統領各部，這纔可說『總羣官而聽曰省』。

漢朝丞相有丞相府，而中書尚書並不稱省，可見楊收所說

的漢制實際上仍是唐朝的制度；可以解釋唐朝省寺臺監的

意義而不能解釋省字原來的意義。所以三說之中，我以為

第一說比較可靠，即是為了避諱而改禁中為省中。後世因

尚書中書等官署皆設在省中，遂移為官署之名，稱之為尚

書省，中書省。——這是省字的第一次演變。

唐以三省秉政——尚書，中書，門下；宋以兩府秉政

——中書，樞密。金以尚書秉政；元以中書秉政。這是中

中央重要的行政機關。以地方行政區域言之，唐太宗貞觀元年（西六二七）分天下爲十道；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七三三）又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太宗至道三年（西九九七）分天下爲十五路；天聖析爲十八路；元豐又析爲二十三路。金分天下爲十九路。元則除直隸中書省的『腹裏』外，分天下爲十一『行中書省』，流俗簡稱爲『行省』。

——這是省字的第二次演變。

不過『行省』之分雖定於元，而在金朝則已盛行。從本紀考之，金熙宗天會十五年（西一一三七）：『廢齊國，降封劉豫爲蜀王，詔中外置行臺尚書省於汴』（金史卷四）。

天眷元年（西一一三八），『改燕京樞密院爲行臺尚書省』（同上）。至金章宗時，州縣爲元兵所殘破，乃到處設行中書省。如承安二年（西一一九七）：『三月，命尚書戶部侍郎溫昉行六部尚書於撫州。……九月，以胥持國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行省於北京』（金史卷十二）。宣宗貞祐二年（西一二一四）：『十月，置行尚書省於大名府路』（見金史卷十四本紀及卷二六地理志），三年：『置行中書省於河北東西兩路，又置行省於陝西』（同上），四年：『七月甲寅，山東行省檻賊郝定至京師伏誅。十月，河南行省胥鼎遣潞州元帥……帶以軍一萬……援京師』（以上見本紀卷十四）。而東平，平陽，遼

東，婆速路，上京，益都（以上見本紀卷十五貞定元年），河府，河東南北路（以上見貞定二年）等處皆有行尚書省。再從列傳考之，有東平，京東（金史卷一〇八侯蒙傳），有衛州（同上胥鼎傳），有京東山東等路行尚書省（卷一一七國安用傳），還有陝州，徐州（卷一一九完顏仲德傳）：這不過隨便舉幾條以作例，金史中還可以找出很多。看這些材料，金朝有行尚書省者，已有汴，燕京，撫州等十七八處。管理行省的官吏，多半以權參知政事或參知政事任之。參知政事從二品，是副宰相，在元朝簡稱爲參政。他在行省中的職權，大概是鎮壓盜匪，管理軍事，守衛地方，並鞏固京師，京師有緊急事變則以兵援助；其後又以元帥左監軍兼之：這都是金史百官志所不詳而可從紀傳中看出的。簡單說來，金朝的『行尚書省』好像現在的『軍分會』或『行營』。當時以元兵侵擾，立此制度，原是一時權宜之制，故金史地理志不詳載。但是行省的起源，固當託始於此。金朝的行政總匯是尚書省，故稱『行尚書省』；元朝的行政總匯是中書省，故稱『行中書省』。兩相比較，甚可明悉。

但是『行』字也有它的命名的由來，不能不略加敘述。自魏晉以來，有稱尚書爲『中臺』（見三國吳志卷十九諸葛恪傳），有稱爲『內臺』（見通鑑卷二十二）；其隨所管之道，置

於外州，以行尙書事者，則稱之爲『行臺』。行臺之起源，始於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尙書僕射陳泰等以行臺從。然以專征討而設，不爲常制。至後魏始開府置屬，號爲『尙書大行臺』，於一路府州無所不統；但主要的職務還是管理軍事。至後齊纔管民事（同上通典）。隋唐設官尤衆，謂之『行臺省』，主管軍事，兼行兵農刑政（見隋書卷二八百官志，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金元的行尙書省或行中書省便是仿照這種辦法來的。元朝以版圖太大，照應不靈，更不能不設立行中書省了。

明朝初年，亦仿元制，設行中書省。後到洪武九年（日知錄卷二十八『省』字條作洪武七年，據明史地理志，知誤），將行中書省改爲承宣布政司，參知政事改爲承宣布政使。除兩京外，共立十三布政使司。布政司爲分部之名，布政使爲分部之官。所以這些行政區域的正式名詞應當爲河南布政司……，或簡稱河南司……，而不當稱爲河南省……。後於布政使司之上又設巡撫，總督，更不當稱爲省。可是人情樂趨簡便，喜歡因襲舊有稱呼，故制度雖改，而當時流俗仍止稱爲省；沿習既久，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清朝布政使司仍明舊，而積習相沿，稱之爲省，亦仍明舊。到乾隆

年間，爲着正名，還打過一場筆墨官司。乾隆五十三年，洪亮吉作成了一部書，體例略同元和郡縣志與元豐九域志；分直隸山西各布政司敘述；每司所轄，各冠以圖，名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洪氏的意思，是要把布政使司分轄府廳州縣（見原書序及卷幅閣文集卷八與章進士學誠書）。章學誠反對洪氏，勸他將每布政司所管轄的改爲總督巡撫，即章氏地志統部一文中所謂『部院』（見吳興劉氏刻章氏遺書卷十四）。這因爲明清的制度，總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銜或兼兵部尙書銜，巡撫兼副都御史或兼兵部侍郎銜（見歷代職官表卷五十），故他要簡稱總督巡撫爲部院。章氏列舉十條，以明當稱部院的理由，並回駁洪氏之書（見地志統部文）。二人駁難，各有所見。然清朝『律令典例，詔旨文移，皆有『直省』之稱。惟一統志尙沿舊例，稱布政使司，偶未改正』（同上）。到了現在，皆從簡便稱省，並且習焉不察，少知其演變的了。

總上所述，省字初由禁中變爲省中，其次變爲官署之稱，其次變爲行省；後來以訛傳訛，避繁就簡，便祇簡稱爲省了。

中倭交通路線考

王輯五

一 緒言

中國正史，自隋書以上，常見『倭』名而並無『日本』之稱；自舊唐書以下，新唐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乃載『日本』二字。本文所以標題爲『中倭交通路線考』而不題『中日交通路線考』者，因所論及之範圍，僅至隋書爲止，隋書以下則略之故也。按中倭之交涉往來，自日本遣隋使以降，始逐漸頻繁；日本史籍之記事年代，亦自推古天皇派遣小野妹子等入隋之年（隋煬帝大業三年），始與中國史籍之年代相符合。故自隋代以降之中倭交通，雖均載於中日兩國文獻中，而自隋代以前之中倭交通，則史籍上恒不多見；爲欲澈底檢討中倭之古代交通，除依據古文獻外，又不得不參照考古學上之遺物遺跡及原始時代之自然海流等以言之。

按中倭之古代交通路線，以利用日本海的左旋回流，由朝鮮南部東下，而得至日本山陰地方之自然航路爲最早；次爲魏志東夷傳上所載之由朝鮮帶方郡南下，經對馬壹岐而至日本九州之航路。後者，因魏志上記載甚清楚，

故人多知之；前者則以缺乏史籍可徵，故易受忽視。近來日本學者爲測驗此自然海流航路起見，曾用投瓶法等實驗六七年，方確定此向日無人注意之自然海流航路實爲中華民族東渡之最古航路。

二 日本海左旋回流與中華民族之東渡

（一）日本海之左旋回流

日本人素稱爲唯一古文獻之日本書紀，是於西紀七二〇年，舍人親王與安麻呂奉詔編成者。在此書中，曾載：

素盞鳴尊以埴土作舟，由新羅曾尸茂梨渡至出雲。

同書又載：

垂仁天皇三年，新羅王天日槍至但馬國。

其他日本史籍所載之由半島渡至或漂至日本山陰北陸地方之史實，亦數見不鮮（請參照拙著徐福與海流一文）。惟當時對於由半島渡至或漂至日本之原因，恒未加以注意與究察。迨至日俄戰後，日本敷設於海參崴港外之機械水雷，因戰後俄國怠於掃海工作，此三百餘隻會漂浮於海面之水雷，因

受日本海海流之推進，漂流而至於日本之山陰北陸沿岸者殆達二百隻，幾佔全數三分之二。至是始惹起一般人之注意，開始對於日本海之海流進行調查。首創此具體調查方案者，爲和田雄治博士。在一九〇六年，和田博士受日本水產調查會之委託，試用投瓶法以測驗之。其投瓶地點在朝鮮半島西岸仁川及東北岸圖們江之間，其中尤側重釜山與清津之間。其所投之瓶爲空瓶，上貼番號，任其漂流，截至西紀一九一二年止，曾投入空瓶七百五十個；其漂到海岸而卒被發現者，計達百三十二個。同時日本海軍省水路部爲調查日本海之海流起見，亦於西紀一九〇八年實行投瓶測驗法；在投瓶五百五十個之中曾發現二百零七個。總計兩方面實行投瓶之結果，其漂至海岸被發現者，前後計三百三十九瓶；其中漂流到日本之山陰北陸沿岸者計達二百七十四瓶，佔全數百分之八十有奇，竟居大多數；足證日本海之海流具有向左旋回流之實力。至關於水雷及投瓶的發現地點等，據和田博士的調查（詳見歷史地理雜誌第廿二卷第三號），如左所示：

山陰道

水雷 五一

投瓶 三一

北陸道

東海道

水雷 一九七

投瓶 二四三

水雷 一八

投瓶 一

南海道

水雷 二

投瓶 一

西海道

水雷 一

投瓶 無

北海道

水雷 四四

投瓶 四五

千島海岸

水雷 無

投瓶 一

庫頁島海岸

水雷 一

投瓶 二

朝鮮東部海岸

水雷 六一

投瓶 一四

琉球海岸

水雷 無

投瓶 一

據以上調查，足證日本海中之左旋回流恒爲由朝鮮半島往日本山陰北陸地方之一種自然航路，此蓋半島上之新羅人所以多漂流至日本出雲等地方之唯一原因也。蓋日本

海之海流，原有間宮海峽寒流與對馬海峽暖流二者；由間宮海峽發源之寒流，沿俄領沿海省東岸及朝鮮半島東岸南下，適與由南而北之暖流衝突於對馬海峽，其結果，溫度低，比重大之寒流，潛伏於溫度高，比重小之暖流之下；並沿其周圍陸地而成爲左旋回流。此種向左旋之對馬海流乃沿山陰北陸海岸東北而行；迨至津輕海峽及宗谷海峽，遂分爲大小枝流，漸次微弱，直至庫頁島西岸而消滅。此種向左旋之日本海流遂爲中華民族由半島東渡之最古航路矣。

(二) 中華民族之東渡

我國自殷末及戰國以降，內亂頻仍，人民不堪虐政之壓迫，相率隱避於東瀛樂土或求自由天地於半島者，在在有之；如箕子之封於朝鮮，衛滿之率燕民避難於半島，徐福之率秦人入東海等，史籍上固數見不鮮。此具有高等文化之中華民族之東渡，對於東瀛島民之文化及其民族血統上將必發生莫大之影響。然則，中華民族東渡之途徑若何？當航海術未發達之時代，中華民族是否趁日本海之左旋回流，由半島而東渡至日本？此等問題皆有考證之必要。

按自箕子衛滿等入朝鮮以來，中華民族移居於半島者

日有所增，或由遼東經半島北部而南下，或由山東半島而至朝鮮南部之辰韓。迨至漢武帝征服朝鮮，在半島建設樂浪等四郡後，中華民族移殖於其間者遂益夥。此居住於半島上之中華民族羣，更爲滿足其探險慾及擴張慾起見，自不免向海外移殖；惟因當時航海術及造船術之不發達，卒不免被日本海之左旋回流漂泊至日本山陰地方。由此可知史籍上所載之我國古代海外殖民團，概多以此日本海回流路爲其唯一之航路。在木宮秦彥氏所著之日支交通史第一章中曾云：

在日本越前國坂井郡，曾發現流水紋式銅鐸，此銅鐸之圖紋上，畫一人乘之獨木刳舟；舟之兩旁，具有十數根如蜈蚣足之附木，蓋以爲防禦顛覆之用。如此裝置之獨木舟，似爲當時由辰韓乘而渡海，順流以漂至山陰地方者。

當造船術未精，航海術尙未發達之時代，由辰韓乘此獨木舟，沿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而漂流至日本山陰地方，固一近情之推測也。

又梅原末治氏所著從考古學上考察出來之古代日鮮關係（朝鮮雜誌第百號）中，曾謂：

在畿內大和發掘之銅鐸形狀，頗類似先秦時代之古

鐘。近年在朝鮮慶尙南道慶州入室里發現之四寸許之小銅鐸及蒲鋒緣細紋鏡，與大正七年（西紀一九一八年）在大和國葛城郡吐田鄉發掘之遺物實屬相同。且其製造術均受中國文化之影響，恐此先行之於辰韓，然後傳至日本。

按朝鮮慶尙南道爲新羅國及辰韓之故地，亦常爲趁日本海之左旋回流漂至日本山陰地方之出發地，而由朝鮮南部與日本畿內所發掘之銅鐸，不但彼此相同，且其形狀與製法亦均與中國無異；即此可知此日本海回流路又爲中國文化東渡之最古航路也。

更據栗山周一氏所著之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第二章：

銅鐸民族之興盛時代，概以西紀前二百年前後爲中心，而上溯至西紀前四五百年；從此點看來，但馬民族說及秦人說，確是最有力者。……繁榮於奈良及平安之秦氏，在聖德太子時代，已有非常之勢力；秦氏一族之渡涉及其年代，在從來之日本史上雖均列爲有史時代之史實，然此必爲天降民族及倭國建國以前之事實無疑。換言之，秦代滅亡固不出西紀前二〇六年，而秦人之大舉由半島南下，沿山陰之交通線而繁殖於近畿之中心地域者，似亦以

西紀前二〇六年爲中心。

按栗山周一氏爲目下研究日本古代史中擁有相當權威之地位者，如果彼所主張之年代正確無誤，則利用此日本海回流路爲中華民族東渡之航路者，當爲西紀前二三世紀以前之史實也。

至於中華民族趁日本海海流東渡至日本山陰地方後，其活動情形如何？彼輩始終住在山陰地方否？此似亦有探究之必要。在栗山周一氏之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第三章中，曾謂：

南方島嶼民族乃沿九州而定住農耕；在西紀前二世紀左右，其人民曾組織一原始國家。……但在此時以前，又有由大陸經過半島而一時定住於山陰。嗣以人口漸多之故，遂以近畿爲中心，而其勢力漸及於四國，中國，北陸及東海道方面之出雲民族。出雲民族與南方系馬來派民族異，不是米食民種，乃是大陸系民族。

同書第二章中，又謂：

秦人之大舉由半島南下，乃沿山陰之交通線而繁殖於近畿之中心地域。

由是可知日本史籍上所載之出雲民族，原不外秦人系大陸

民族渡至日本出雲地方之民族，亦即是與考古學上所說之銅鐸民族名異而實同。換言之，秦人系大陸民族先經由半島而漂至山陰出雲地方，旋因人口增多之故，漸次東移，繁殖於近畿大和等地方。迄今秦氏仍多住於奈良及平安等地方者，乃其明證。近據日本考古學者鳥居龍藏，喜田貞吉及梅原末治之研究：

小形厚手流水紋之古型銅鐸，多被發掘於山陰北陸至畿內之間；而大形薄手袈裟襷紋之新型銅鐸，多發之於畿內至東海道南海道地方之間。

此又爲秦人系大陸民族即銅鐸民族之先定住於山陰等地方，然後漸次東移至本州腹部諸地之一良好左證也。

又梅原末治氏在藝文雜誌第十一年第四號上，曾發表銅鐸之研究一文，上並附一銅鐸出土地名一覽表。據該表之所示，足知銅鐸民族之分布地點，東至加賀，越前，美濃，三河，遠江，西至石見，安藝，讚岐，阿波，土佐，適以畿內大和爲中心。藉此亦可想見當時中華民族東渡至日本後之分布狀態。

三 古文獻上所載之中倭交通路

(一)

在中國古文獻中，首先記載倭人者，推山海經。

海內北經曰：

南倭，北倭屬燕。

次於山海經之漢書地理志，亦云：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二書雖均書有倭名，而並未載倭人入貢之路。且山海經及漢書上所載倭事多係傳聞附會之辭，此則於拙著倭國考中亦已論及。

後漢書東夷傳中敘述較爲詳實：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師升等（註一）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按後漢書爲劉宋之范曄所撰，猶較晉陳壽所撰之魏志晚百餘年，故後漢書東夷傳之記事多有根據魏志之史料而略加以改竄者。如後漢書東夷傳之：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

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乃依據魏志東夷傳中之下列記事者：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

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

後漢書東夷傳中之：

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

乃根據魏志東夷傳中之左列記事，而略加以改竄者：

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里。

蓋漢武帝雖曾在半島置樂浪等四郡，而尙無帶方郡之名，

自後漢末公孫氏佔據遼東時，始將樂浪郡之一部設置帶方

郡；故范曄編纂後漢書東夷傳時，雖以魏志爲基本材料，

而終不得不將『帶方』改書爲『韓』，帶方郡之『郡』改

書作『樂浪郡』。又范曄依據魏志東夷傳之『女王國東渡

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而在後漢書東夷傳中竟改

作『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狗奴國，雖皆倭種，而不

屬女王』，有失原文之旨。但後漢書東夷傳之記事並非僅

據魏志一書者，魏志東夷傳中所未載而反見于後漢書東夷

傳中者亦有之；如：後漢書東夷傳所載之光武帝賜予倭奴

國以印綬之事，魏志上付諸缺如者，是也。

在後漢書東夷傳中雖亦未載及倭人入貢之路，惟光

武帝所賜予之『漢委奴王』金印業於西紀一七八四年二月在九州筑前地方發見，可知與後漢往來之倭人乃居住於日本九州無疑也。且傳文中既稱『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復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然則其入貢於漢所經由之道路，當不外由其所居住之九州北行，經朝鮮半島而至於漢京也。

試就考古學上之遺物遺跡考察之，在梅原末治氏所著

銅劍銅鐔（史林第九卷二號）中，曾謂：

北九州發掘之銅劍銅鐔，在西紀前後二三世紀間，

已製造使用之，乃由中國經朝鮮，漸次傳入於北九

州者。其分布區域，殆以北九州爲中心，南及於大

隅，迤東亦稍波及於四國及本州西部。就中以九州

之筑前博多灣沿岸分布最密，近發掘者已達二十二

個所，八十五口。次爲對馬島，迄今發掘者達十七

個所，五十九口。在九州筑後發掘者，達十五個

所，四十八口。在九州豐後發掘者十二個所，四十

三口。且在北九州發掘之銅劍銅鐔中，其鋒銳而

利，備具中國製品之風味者不少；惟至深入日本內

地，則多鋒寬而鈍之不實用之大形。至對岸朝鮮方

而，以弁辰之故地即今之慶尙道發掘之銅劍銅鐔較

多，達三個所，十一口。

果梅原氏之研究調查正確無誤，則由我國文化所產生之銅劍銅銼，當在西紀前後二三世紀，經朝鮮南部及對馬島等而至九州北部諸地；即此可以推知當時中倭交通路線乃由九州經對馬島等而至朝鮮，更由朝鮮而至中國者，可斷言也。

(二)

降至三國時代，盤據於九州之倭女王國，為憧憬中國之燦爛文化，遣使入貢者，前後達四次，魏亦遣使入倭者二次；於是中倭之交通往來，較前頓呈熱鬧之狀。晉陳壽所撰之魏志東夷傳，為研究魏倭交通之唯一史料，亦為研究古代日本之一良好資料，前已略為述及。至其所根據之史料，多為魏魚豢所撰之魏略等書，故較其他史料富於真實性。至魏志東夷傳中所載之魏倭交通路，概不外如左列所示之由帶方郡至邪馬臺國之行程：

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東南至奴國百里。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南至

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摘錄魏志東夷傳）

上記自帶方郡，經過狗邪韓國，對馬國，一大國，末羅國，伊都國及奴國，至不彌國之行程，經一般學者就下列地名及方位等考證之結果，大體堪稱一致。即：

狗邪韓國 魏志東夷傳弁辰條，有弁辰狗邪國，其國為弁韓十二國之一，蓋即倭人傳中之狗邪韓國。朝鮮史籍上之伽邪國，日本史籍上之加羅國，均與此相當，即今之朝鮮金海地方，乃為由韓渡日所必經之要津。故郡使自帶方郡（即今朝鮮京畿道南部）循海東南行，卒至狗邪韓國。

對馬國，一大國 魏志上對馬國，宋本三國志作對海國，誤也。按對馬國即今之對馬島。一大國乃一支國之誤，由北史及梁書上之記事足以證明之，即今之壹岐島也。對馬壹岐兩島位於半島與九州之間，故為郡使由韓渡日所必經之途徑。

末盧國，伊都國 魏志上之末盧國，與古事記上之筑紫末羅縣及日本書紀上之肥前松浦縣相當，即今九州之肥前松浦郡（日本人讀「松浦」為「Matsura」音，亦與魏志上之「末

虞』音類同)，迄今仍爲往來日韓船舶之碇泊要地。伊都國即古事記上之筑紫伊視縣，乃今之筑前怡土郡。故郡使自對馬壹岐南行渡海，至九州肥前之松浦登岸，再陸行至筑前怡土郡，此乃爲郡使常駐之地。

奴國，不彌國 魏志上之奴國，與日本書紀上之儼縣相當，即今之筑前那珂郡博多地方。不彌國即應神天皇誕生地之筑前宇彌（日本人讀作，Cei音），間亦有主張在筑前之太宰府附近者，俱爲當時要地也。故郡使由九州筑前之怡土郡，向東南陸行，可至筑前那珂郡；再往東行，遂至筑前之宇彌地方。

惟自不彌國以下，經由投馬國至耶馬臺國之行程，學者意見紛歧，迄未衷於一是。若就方位言之，魏志既云由不彌國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耶馬臺國，女王之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然則投馬國與耶馬臺國當均在不彌國即今九州筑前之宇彌地方之南，仍不出九州範圍。而內藤虎次郎博士在其所著之卑彌呼考（藝文第一卷第二至第四號）中竭力主張『南至投馬國』之『南』字及『南至耶馬臺國』之『南』字均爲『東』字之誤，而將耶馬臺國強作東方畿內大和說者，似屬勉強。

再由里數及日數上考察之，據魏志東夷傳所載之由帶

方郡至不彌國之里數，共計一萬七百里。同書又載自郡至耶馬臺國，爲萬二千餘里。是則自不彌國至耶馬臺國當爲一千三百里。若將此里數合成現在里數，或亦可爲推定耶馬臺國方位之助。據白鳥庫吉博士之里數考證（見於白鳥博士之卑彌呼女王考一文中），魏志倭人傳之一里約合日本一町左右；自郡至不彌國之一萬七百里，約當現在日本二百九十里，亦即合現在中國一千九百七十七里。則自不彌國至耶馬臺國之一千三百里，約當現在中國二百四十五里。換言之，耶馬臺國之所在應求之於不彌國南二百四十五里之地方，方爲合理。但魏志所載之由不彌國向南水行二十日，又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始至耶馬臺國者，究竟在此僅僅二百四十五里之路程中，何得有水行三十日及陸行一月之期耶？且一般學者既認定不彌國在九州筑前地方，則不彌國之南當爲廣大之陸地所包圍，並不通任何河川，又何得云從不彌國向南『水行二十日』，又『水行十日』耶？

吾人試平心靜氣以思之，自郡至不彌國，歷經數國，各國間之距離，皆詳載里數；惟自不彌國以下，里數則付諸缺如，僅以水行陸行之日數填補之而已。然則此填補之日數究竟確實可靠乎？是固不能不加以考證與檢討者。

魏志東夷傳既多取材於魏略，而張楚金著之翰苑，其

中所引魏略本文，無『水行二十日』，與『水行十日，陸行一月』之語。按魏略一書，今雖散佚，翰苑所引，尙可徵信；原本之魏略既未爲水行陸行之日數記載，可知魏志作者必別採其他史料。當倭女王卑彌呼時代，魏使入倭者前後二次，魏使入倭之見聞錄當爲魏志所根據之史料之一。按第一次遣倭使梯儻等一行在魏正始元年（西紀二四〇年），適當卑彌呼女王健在之時，若魏使梯儻等果親至耶馬臺國，以上國大使之資格，必得親見女王；即使不能，亦必得見其佐治國之男弟，方爲合理。果能親見此善事鬼道之女王，或其佐治國之男弟，當必作一篇精詳之文字以描寫之。惟觀魏志所載，彼等之真實姓名，魏使尙不得知，僅以空疎之官樣式之文字，如：

以婢千人自侍，……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

等非寫真的文筆形容之，足證梯儻等不但未見女王及其弟，即女王所都之耶馬臺國恐亦未至。彼等一行僅到伊都國爲止，最大限度恐不能過不彌國。試觀魏志上所載之投馬國之五萬餘戶，耶馬臺國之七萬餘戶等，就此龐大不實之戶數觀之，益足證實以上觀察之不誤。梯儻等既未至耶馬臺國，則至投馬國及耶馬臺國之里數當非所知，自不能

不付諸缺如。故以『水行二十日』與『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填補於投馬國及耶馬臺國之下者，實非梯儻等所爲，乃魏志作者強引第二次遣倭使張政等之見聞錄，加以改竄而成者也。

按遣倭使張政等一行，後於梯儻等之入倭者八年，若就魏志東夷傳中之：

卑彌呼以死，大作冢徑百步，徇葬者奴婢百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壹與，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

觀察吟味之，張政等既以檄諭倭王壹與，壹與並遣倭大夫將張政等送還，則張政等一行曾親到耶馬臺國，可斷言也。張政等既親到耶馬臺國，當必有一番行程記錄。在太田亮氏所著日本古代史新研究中，推測由帶方郡至對馬國，水行二十日，由對馬國至耶馬臺國，水行十日，陸行一月之行程記錄，深恐即是張政等所爲也。

但魏志作者竟將『對馬』誤視作『投馬』，又見梯儻等之見聞錄中，不彌國以下之里數均付諸缺如，遂將張政等之見聞錄中『水行二十日』一句填補於投馬國之下，以

『水行十日，陸行一月』二句填補於耶馬臺國之下；於是耶馬臺國大和說與耶馬臺國九州說之對立基因，從此胚胎矣。

果明乎此，則耶馬臺國之所在，就上面方位，里數及日數上考證之結果，當在不彌國以南之地，即今九州肥後北部地方。投馬國乃在今九州之筑後三瀨郡地方。蓋據日本古代人口戶數之調查，在九州全土以肥後北部菊池郡山門鄉之戶數爲最密，日本古文獻之和名抄上已載有『肥後山門鄉』之名，故此山門鄉或爲當時耶馬臺國女王所部之地。再者，『山門』二字之日本讀法爲“Yamato”音，亦與魏志上『耶馬臺國』音類同；因當魏使入倭之時，倭人尙無文字，當時雖有“Yamato”地名之音，而無文字以填補之，故魏使不得不依“Yamato”音而譯作『耶馬臺』國。至若投馬國之名，亦因筑後之三瀨郡之日本讀法而譯成者。蓋日本人讀『三瀨』爲“Mitsuma”音，而『三』字讀作“ミ”音，與『御』之讀法同，有冠詞之意；『瀨』字讀作“Tsuma”，魏人遂依此“Tsuma”音而譯作『投馬』國矣。

由此可知在三國時代，中倭之交通往來，乃由朝鮮帶方郡南下，經對馬壹岐而至九州肥前之松浦上岸，經筑前

之怡土郡及那珂郡等地方，而至肥後之倭女王國。在此中倭之交通路上，自魏景初三年（註二）以降九年間，魏使與倭使公然往來者，魏志上已載有六次之多，其未載諸史籍者常更不知凡幾，足證三國時代中倭人士往來於此交通線上之頻繁也。

至若當時由朝鮮帶方郡至魏都洛陽，其所經由之途徑若何？魏志上雖未載及，而就當時之情形及文獻通考之記事觀之，似由帶方郡經遼東，陸行至洛陽者。據元馬端臨所撰之文獻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其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故其迂迴如此。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

此言優足以證明之。蓋當時航海術尙未發達，海路猶不如陸路之安全；且魏自滅公孫氏，併樂浪等郡後，威震半島，更無敢有作陸路交通之阻梗者故也。

(三)

三國以降，迄于隋代，中倭之交通路線若何？是否與魏倭路線稍異？似亦有論證之必要。在中國史籍方面，晉書武帝本紀及安帝本紀中，僅載倭人來獻方物之年，而未涉及其入貢之路。梁沈約所撰之宋書夷蠻傳，其所載之倭

人，於宋高祖永初二年（西紀四二二年）以降，約六十年間，前後入貢凡八次，其通聘於南朝宋者不可謂之不密。且宋書所載倭王入貢於宋之事，與南史夷貊傳所記亦屬相同；而宋書及南史所載之入貢於宋之倭王譜：珍，濟，興，武，日本學者如吉田東伍及松下見林等（註三），亦一致承認爲日本史籍上之仁德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安康天皇（其詳細考證，容後再行介紹發表，茲從略），其記事亦不能不謂之正確。惟涉及其入貢於南朝宋之航路，僅有宋書夷蠻傳所載之倭王武（雄略天皇）捧呈於宋順帝之表文中之下列數語而已：

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

在日本史籍方面，日本書紀雄略紀中，曾載：

十年九月戊子，身狹村主等將吳所獻二鵝到於筑紫。……十四年正月戊寅，身狹村主青等，共吳國使，將吳所獻手末才伎，漢織吳織及衣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

按日本書紀上所載之吳國，並非指孫權之吳國，乃是指南朝宋而言，此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倭人既不斷通聘於南朝，其入貢於南朝之路，則曰道經百濟；而由南朝返倭國

時，一則曰到九州筑紫，一則曰泊於畿內之住吉津；由是可知在南北朝時代，倭人入貢之路，概由畿內難波之住吉津解纜，沿瀨戶內海至九州筑紫，再北經對馬壹岐至朝鮮百濟，更由半島而至南朝者。當時倭人之所以未能由九州筑紫橫渡東海而至宋都建康者，蓋以當時航海術尙未十分發達，恐生意外危險故耳。

迨至隋文帝統一南北，日本聖德太子深慕中國之燦爛文化，遂有遣隋使之舉，隋文帝亦遣使者往，於是中倭之交通因之大盛。隋書倭國傳云：

明年（大業四年），上遣文林斐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華夏，以爲夷州，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按傳中之竹島，爲朝鮮全羅南道珍島西南之一小島。耽羅國即今之濟州島。都斯麻國即今之對馬島（日本人讀對馬爲“Tausima”音）。一支國即今壹岐島。竹斯國即今九州之筑

紫（日本人讀筑紫爲“Chikushi”音）。至關於秦王國之所在，雖有安藝嚴島說，讚岐說，周防說及難波說之分立，惟據各方面考察之結果，似以松下見林及木宮泰彥（註四）所主

張之周防說爲是；蓋當時山陽道之西部多秦氏之居住地故也。

據以上隋書倭國傳之記事，隋使之入倭乃由百濟南下，經對馬壹岐而至九州之筑紫，更東行沿瀨戶內海至畿內之難波津；此則與南北朝時代之中倭交通路線大致相同者。至由半島經對馬壹岐至九州之航路，恐始自三國以降。蓋三國後，日本列島上曾發生劇烈之民族移動，都於九州之耶馬臺國因受其南鄰狗奴國即今熊襲部族（據魏志東夷傳所載）之侵害，不得不率族東遷，以求躲避於一時，是以日本史籍上有神武天皇東征之神話化之記事。至其東遷之結果，遂與盤據於畿內大和之銅鐸民族即秦人系大陸民族衝突，其勝利卒歸於比較野蠻之倭政府（魏志上所載之倭女王國，卽爲此倭政府之前身，亦卽日本史籍上所謂大和政府；詳見拙著日本建國年代考及倭國考二文）；旋統一畿內，並征服列島，而畿內之難波津亦遂爲交通上一要地，成爲往來中國之出發地與着岸地矣。

至於由百濟至中國所經由之途徑，是否橫斷黃海而至中國？抑或仍經遼東而陸行至中國內地？據當時之情形推測之，在南北朝時代左右，高句麗正雄峙於半島，爲爭半島南部，恒與倭人相鬥爭，而爲倭人入貢道途之梗，此則

上舉之宋書夷蠻傳倭王武表文中之記事足以證明之。文獻通考卷三二四四裔考中亦云：

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

可知在南北朝時代左右，已不若三國時代之由百濟路經遼東而至中國首都，乃是由百濟橫斷黃海而至中國。至若由百濟沿高句麗西海岸北上，經遼東半島而至山東之航路，乃爲唐代與新羅渤海等國往來之路線；由九州筑紫直橫渡東海而至長江口之航路，乃爲遣唐使所經由之航路矣。

四 結論

綜觀中倭之古代交通，由海流上及古文獻上考察之結果，在航海術未發達時代，往往利用日本海之左旋回流，由半島漂渡至日本山陰地方；由銅鐸遺跡的分布狀態上，足證明之。且在此自然海流之航路上，不但爲我中華民族東渡之唯一古代航路，而亦爲中國文化東渡之最古途徑。惟倭人入貢於中國所經由之航路，既無法利用此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而彼輩幼稚之航海術，又不能橫斷此汪洋無邊之日本海，故不得不由北九州經對馬壹岐而至朝鮮半島。

試就地理上言之，北九州與半島南部僅隔咫尺，且有對馬壹岐諸島突出於其間，苟其航海術稍能橫斷朝鮮海峽，則由九州至半島之航路常不難實現。

更就當時日本列島上情形言之，據前後漢書及魏志等所載，在三國以前，列島上尙呈諸部落分立狀態，就中以九州之部族（如倭女王國及狗奴國等）爲最強（參照拙著日本建國年代考），往往爲憧憬中國文化而入貢於中國。（如上面列舉之前後漢書，魏志，晉書，宋書，南史及隋書等所載之倭人入貢事，乃其明證。）

然則彼輩來中國時，由其居住之九州北上，經對馬壹岐而至半島之航路，殊屬合理，且係捷徑。故由北九州至半島，更至中國之航路，隨倭人入貢之頻繁而日趨於繁榮。凡前後漢書及魏志等書中所載之入貢倭人，想概由此航路而至中國者。試觀後漢光武帝賜予倭奴國金印之在九州發現，及銅劍銅銚遺跡之分布狀態，不難證明。且魏志所載之魏使入倭之路，亦即經由朝鮮九州間之航路者；足證當時由半島東下，趁日本海回流的自然航路，早已無人過問，而由半島南下至九州之航路，乃當時唯一主要之交通路線也。

嗣後迄於隋代，此由朝鮮至九州之航路仍不失爲中倭往來之主要幹線。惟爲三島上集團民族之移動，及政治

中心地由北九州東遷至本州畿內大和之故，而此航線遂不得不更由北九州而延長至於畿內之難波津矣。隋書倭國傳所載隋使入倭所經之航路，正是當時中倭交通路線之縮影也。

註一：在內藤虎次郎博士所著之委面土國中，曾主張後漢書安帝紀

永初元年入貢之倭國爲倭面土國，見藝文第二二年第六號。橋本增

吉氏亦力倡此說，見史學雜誌第六卷第二號中之在支那史料上顯

露出來之日本上代一文。

註二：據內藤虎次郎博士之考證（見藝文第一一年第二至第四號之卑

彌呼考一文），魏志東夷傳上所載之景初二年六月爲三年六月

之誤；蓋景初二年八月，司馬懿始斬公孫淵而平樂浪等郡，及至

此事盛傳於韓倭，倭女王因畏懼而遣使奉貢者，當爲翌年六月事也。

註三：見吉田賢龍之日韓古史斷及松下見林之異稱日本傳。

註四：見松下見林之異稱日本傳及木宮泰彥之日支交通史第五章。

附識

余在師大月刊第十九期中，曾發表中倭之古代交通路一文，祇以倉促成稿，簡陋之處，在所不免；故乘茲暑期之便，復加以增補訂正而發表於此。

蒙古的王公，僧侶，與平民階級

美國拉丁摩著 侯仁之譯

本文初次介紹見本刊三卷六期拙譯「蒙古的盟部與旗」一文之

引言，茲特儘先譯出作為「Mongols of Manchuria」一書前六

章之縮論。「蒙古的盟部與旗」之以下數章，即將繼續譯，依次

於本刊發表。——譯者

外蒙古的社會革命，一般人很容易輕輕放過，以為只是一種虛幻不實的宣傳，表面上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新名詞

來掩飾，骨子裏却是舊俄帝國主義的繼續，僅欲擴張俄羅斯的勢力到蒙古而已。內蒙古的民族運動，一般人也很容易輕輕放過，以為牠的人口太少，天然資源太薄，社會制度又是野蠻時代的遺物，緊緊將牠束縛起來，永遠沒有現代化和改進的希望。人都以為蒙古民族已逢末運；牠乃是命中注定了要受俄羅斯，中國以及日本在滿洲新「聯邦」帝國（「Federative」 empire）的瓜分與蠶食的。

具有類此膚淺而籠統的見解的人是如此之多，使我們不得不推測到蒙古的國際關係之調整問題在最近是很難得到完善的解決的。其實，蒙古的人口問題只是由於一種疫症——梅毒，而這種疫症並不難處置，只要有有效的公共衛生機關馬上可以解決，而且在外蒙古已經得到了確實的

有力的證明，在滿洲內的蒙古區域也已得到部分的解決。這樣，蒙古人不久便可增加起來。至於天然資源問題，也不是沒有辦法。蒙古的人口問題與天然資源問題，皆不擬於此詳論。唯擬對於蒙古的社會組織問題，加以解釋，因為關心蒙古問題者對於蒙古的態度，將依據其對於蒙古社會組織的解釋與認識以為轉移。

認蒙古民族為野蠻的觀念，乃是由於中西論者一種共同的偏見所致：以為凡逐水草居氈帳的游牧民族，其文化必較定居村落中的農業民族低劣。在這一點上，共產主義的社會史觀（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更較正確切實。文明乃是閒暇的產物，而自古迄今，閒暇則繫於社會組織。凡一階級能攫取其他階級生產的財富而自得生活於安閒中時，文化才有可能；社會史觀的最後理想，亦即其最為革命獨到之點，即欲達到人人不相剝削而仍有閒暇享受的地步。

財富的如何生產以及閒暇的如何享受，皆無關緊要。最關緊要的乃是剝削之結果如何作用的問題。以馬克思根據西方機器文明而創的無產階級獨裁觀念，應用於蒙古人

的部族組織，或似荒謬。但第一，如吾等姑定無產階級的學說可以實行，第二，又因吾等也可以在蒙古史上發現相當於西洋社會中勞資階級的階級成分，則應用社會革命的觀念於蒙古問題，非但不是虛妄，恐怕還要算最合理的。

吾人苟以此等眼光來檢討蒙古史，那麼便可立時見到蒙古社會非但不是原始的，甚且已經演化到至為複雜的地步；蒙古社會乃是一個具有財富，閒暇與威力的社會。不過如欲明瞭蒙古社會的特性，必須時時涉及中國歷史。其相互的密切關係，有如此者。蒙古民族史乃是一串首尾連貫的塞北民族與替史中最後的一章，而此史之久遠，蓋可與中國史相埒。中國自從有史以來，據今長城一帶地方的部族即屢見於冊籍。自從長城由胚胎而形成，由片段獨立的堡壘而貫串為連續無缺的防禦陣綫時起，異族的侵略便迴環連續自滿，蒙，中國土爾其斯坦以及西藏等地絡繹而至。在侵略中間的寧靜時期，中國得以恢復長城邊疆的統治時，中國僅能以互盟與賄賂的手段維持其統治權。意思就是說：塞北民族雖不入侵中國，而仍能對中國施以財政的剝削。各部族間的相互戰爭也達到了同樣的結果。部族混合的勝利錦標，即是在略邊的獲掠中或中國的賄賂中攫

得最大的一份特權。

如此，則一般的塞北民族史以及特殊的蒙古民族史乃可以凝練成功一條簡單的公式。一般言之，中國乃是一「殖民的」(Colonial)被剝削區域，蒙古則為剝削人的「帝國主義」者之根據地。誠然，中國社會上自有其各別的階級史，和對內帝國主義的剝削之記錄。蒙古社會亦自有其各別的社會組織。但就大體以及二者之相互的關係來說，則蒙古民族不得不稱為優勝民族，而中國民族則為被剝削民族。

在優勝民族之內，階級的對立漸失其嚴重與尖銳的程度，因為上下各階級皆可自被治民族的財富上享受一種不勞而獲的收入。貴族階級是軍隊的領袖以及侵略與剝削的組織者，故得享受大部的利益，閒暇，財富與文明。但是平民所得，亦足使其安分守己，唯期於帝國主義制度之內努力上進，並不想打破此種制度，推翻其統治階級。一般講來，此不但於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之膨脹期為然，即於亞拉伯，蒙古，土耳其前後幾次的大征服亦莫不皆然。(雖然，即在優勢的工業國家中，如英國工業化的初期，下層階級亦有受害者。在征服的遊牧民族中則無此等現象，但此一不同點，無關重要。)

沿中國長城邊疆一帶，征服之循環重複，朝代之廢替興隆，歷數千年而其性質未變。此時期，王公制度遂形成一成不變的制度。平民對待酋長，敬之甚或愛之。既便是最兇狠的部族之混戰亦不足引起對於制度本身之憎恨，蓋人人皆稔知：在部族混戰之中，終必有衆王之王出現，可以領導各小酋長作一致對外之征服（普通皆對中國），因此遂又另啟一剝削，安逸與光榮的時代。至十九世紀滿人入主中華時，此種制度已達其最後的表現。滿人在入侵的初期，雖曾征服少數蒙古部落，但就大體言，蒙古民族僅可說是滿人之自願的同盟者。塞北大部武功，都是蒙古民族的功績；同時又助成滿清民族的塞南征服。蒙古人的生活甚爲安逸，其游牧經濟足以自給，凡日用衣食住的大宗物品皆可得之。其剩餘產品則售與中國，以易布匹，絲，茶，米穀等奢侈品。其王公長自中國朝廷領得絲銀等等。部族自身又積屯米穀以備荒旱瘟疫之年以及牛畜減少之虞。蒙人納稅甚輕，亦不像中國農民常受剝削制度之壓榨。最後，彼等並有道德上之自信，自視爲優越的征服民族，有獲取的特權而沒有給予的義務。

唯有一事，阻止此種制度之繼續重演。如果不是西方勢力之東來，滿清一代的壽命亦不過二三世紀而已；結果

將因收入遞減律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之鐵則而崩潰。上一次征服的「投資」，將於叛變苗起中消滅；漢人自主之朝代，將繼以統治中國。塞北各族將又起一場混戰，以產生英主而對中國作再一次之大侵略。

但西方海洋勢力，突將此種循環過程破壞無餘，再無恢復的可能。因爲此種過程之得以維持，惟賴純大陸性的軍事勢力與經濟勢力的作用。今通商口岸之興起，即說明長城之所以衰微。蒙古制度因此乃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其部族組織雖尙得苟延殘喘，但是已經與基本現實割絕，其活力早已喪失。活力惟能以侵略膨脹之戰爭恢復之；但蒙古征服既已不可能，則戰爭必賴國外之同盟。假如舊制度不能再繼續，則必須有新制度以代替之。但此新制度又究竟如何？

在此須對於蒙古社會的形態，在滿清一朝比較寧定的時期內（自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凝結硬化的過程加以更詳稔的檢討。在此期內，蒙古王公（其相互間的混戰——選拔英才的戰爭，而非殲滅或臣服其他王公的戰爭——供給一種動力，對外作有力的征服戰）由積極的民族領袖墮落爲貪婪的，貴族的，享受特權的不勞而食者。蒙古參加滿人剝削中國的所得，大部皆爲

之擄去。王公之領導，發動，與負責的職務，俱已廢弛，唯其習慣的權威仍殘存於後。

不過蒙古人一般社會經濟的生活，仍甚安逸。所以如果不是西洋勢力之參入，則此靜的時期將仍是活動期間之無關重要的休息期。但是西洋國家自海洋方面對於中國所施的壓力，已將歷史的動力倒轉。西洋壓力之直接間接作用的結果，如鐵路之伸張於內蒙以及中國軍隊武備之現代化。此等現代武器，蒙古人無從獲得，因為一方面中國介於蒙古與洋海之間，他方面帝俄雖欲伸張俄羅斯之武力於外蒙古，却並不欲外蒙古有其自身之武備。

在此種歷史命運陡轉之下，蒙古王公階級的作用已經失其時效。蒙古整個的社會組織，適於攻而不適於守；僅能在進取上產生一致行動，不能在防禦上採取一致步調。於取守勢時，各王公自願單獨行動，期以盡量保有一己之權威與特權。階級利益之轉為對內的，表現於部族內不同的階級之間。因特殊階級之存在，唯賴剩餘收入之剝削與享受。又因中國已經不能再担負剝削，先前為特權民族中最下層之蒙古平民，至此遂變為被剝削階級，負擔現已失效之上層階級——失效者，以其不復是民族膨脹的矛頭而僅成爲民族內部階級剝削之金字塔的尖端。

至於上層階級之剝削方式，在此不擬詳論，僅舉其舉二大端如下：第一，先有之中國朝廷的贈祿既然已經不可復得，遂不得不以重稅代之。第二，王公庇護中國商人，助之對於本族平民作商業上的剝削；此外更與中國官吏勾結，染指於殖民土地交易中之利潤。如此才能以本族之疆土實力為代價以維持其舊日一部分的社會權威。內蒙古王公（特別是在滿洲境內的蒙人區）偶或有率領其部屬對於中國的蠶食作武力的抵抗者，但是就先後所遭遇的失敗與耗費而言，在在都可證明王公階級之不足任保障民族利益的重責。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衝突之日趨尖銳，即其致命的弱點。

僧侶階級的勢力，一部分補充王公階級的勢力，另一部分却與之相頡頏。一般人普通皆依據中國方面的通常解釋，以為蒙古的喇嘛教乃是滿清皇帝有目的的培植，期在破壞蒙古人的好勇鬥狠的傳統性。然而這僅算得一半的真理。實則當蒙古人尙是統治中國時，便已採奉喇嘛教。其後，在中國勢力喪失，喇嘛教也曾一時趨於衰微。但是不久又以新的政治意義而重復興起。蒙古人既被逐於長城以北，又開始部族混亂的循環。按往例來說，混戰的結果，當又將造成新的民族之統一與對外的征服。在十六世

紀蒙古部族的混戰期中，喇嘛教的重要性迅速增加；由於王公階級的推重，期以宗教上的聲望，作為政治權威的後盾。內外蒙古以及西部蒙古（包括阿爾泰，中國土耳其斯坦以及青海區）的敵對王公莫不積極希望其家人獲得宗教上的高位，因而得為活佛的現身。如此，則彼時的喇嘛教實際上絕不是一種軟化勢力（demilitarizing force），而確實成為參加部族混戰的一員。

假使此種政治宗教的混戰得以充分發展而達其自然的結局，結果將會成功一十分可畏的政教合一的蒙古帝國。但是趁着蒙古部族的長期混戰，滿洲民族却乘機而起。結果，滿洲民族的興起遂將蒙古部族的最後的統一預先防止。滿人認清其自身的勢力乃是基於蒙古各別部族之忠順的擁護，而不是整個蒙古民族的擁護，因此，滿清政策遂側重於獎勵個別王公的忠順，而防止任何統一蒙古民族的勢力（把這種勢力疎導於較為安全的洩道）。清廷因此分割蒙古政治與宗教的勢力，一面扶持喇嘛教的聲望，一面又禁止王公家族的被選為活佛。僧侶與王公因此乃形成兩個各別獨立的上層階級，彼此的權力由相成一變而為相斥。結果二者乃不能自動的合作，以達其共通的統一。

蒙古相互競爭的王公，於滿清帝室下所享受之特權地

位，已減削其征服侵略的慾望，而統一勢力又被杜絕，故其數目有增無已，而舊有之選拔英才的競爭却不可復得。王公競以資助見好於僧侶寺院。於每一部族內，王公與僧侶交互承認彼此的優越地位。更有喇嘛寺院，且自有其領地；其居民雖非喇嘛却也認為活佛的「門徒」，而非王公的屬民。

再者，因欲阻止產生最高教主的趨勢起見，清廷則獎勵寺院勢力向下的擴張。各寺院的喇嘛數目逐漸增加，直至今日喇嘛之多幾與平民相埒。嚴格的宗教紀律自然因此便不能維持。今日喇嘛教內大半都是虛行故事，昧於教義的愚信者。正直虔信的教徒，苦行的修道士以及學者與幹練之行政家則為數甚少。喇嘛與婦女同居，已是司空見慣的事，不足為怪，甚且有置家立室者。不過寺院以內，尚仍不許婦女躡入。因此，喇嘛教不得認為蒙古人口增加問題上的嚴重障礙。假使在此種靜的組織下，蒙古人的繁殖率如中國人之速，則最後蒙古亦必將發展成功相當於中國地主制度（land lordism）的制度。但事實上，土地乃是部族的共有物（廟地除外）——而非王公的私產。再者，部族的屬地與廟地，在經濟上的用途亦無不同。所謂私產，僅指牲畜而言，並不包括牧地。因此雖有稅收，精明強幹者也

可由繁殖牧畜而致富，並無需投資於土地。貧窮者可先受僱於人，然後以工資購牛羊，僅事牧畜，數年內亦可達到小康的地步。社會上雖也有一種極緩和的奴隸制度存在——其實此所謂奴隸，只是一種世襲的長期僱工而已——但是因為沒有人口過剩以及因失業而起的經濟競爭，雖奴隸也可分享一般的安逸。最後，社會的財富沒有注入外國市場之途徑，其剩餘的財富只有捐贈於喇嘛寺院。

但是既迫蒙古民族失其特權地位，而中國又開始自東南方北侵，同時帝俄之對外蒙古也自居於一種保護國的地位，於是寺院的勢力一如王公的勢力開始轉向而變為對內的，對下的，終施之於一般的平民。僧侶階級亦如王公階級分裂為一區一域之忠順者，而未能形成一種單一的利益。外蒙的僧侶也正如諸王公一樣，協助中國商人以剝削本族的平民；內蒙的僧侶則以部族的土地拱手而讓之於中國的殖民者。再者，僧侶階級內部的分歧以及僧侶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的對立也是一個致命的弱點，一如其為王公階級的弱點無異。如此，所以蒙古的僧侶階級與王公階級可比擬於西歐的資本階級以及中國的地主階級；至於負擔僧侶王公特權地位（此原由蒙古參加滿清對中國的剝削以維持）的平民階級，則可比擬於歐西的勞工階級以及中國的農民階級。

自然，蒙古平民之無產化並非突然而起。蒙古民族所享特權，隨滿清勢力的衰微而消亡。中國在蒙古的殖民以及蒙人的叛變，都已經在滿清帝室傾覆之前開始。西方的壓力雖自一八四〇而後即在中國日趨緊張，但其以可驚的速度傳達至蒙古時，却遠在以後的中日戰爭時期（一八九四—九五）。自此而後，西方壓力迅速的增加，其所及於蒙古的效果確是一種真正的危機。及至一九一一年，清室傾覆之後，舊式的歷史再不能重演，以藉部族的混戰而發洩其精力；却突然在民族關係以及社會經濟制度上遭遇到一種嶄新的勢力。

目下的蒙古社會之分裂，必須就這次危機作背景而加以考慮才可。所謂一九一一年蒙古革命，其實並非革命，也非叛變，只不過是正式宣述蒙古並非中國之一部份的歷史原則而已。蒙古與中國的聯繫本是在滿清帝室之下由人工而造成，滿清既已顛覆，此種關聯亦當然破裂。中華民國所謂有繼承滿洲對於蒙古的盟主權之權利的想法，就歷史來說，全是一種無根據的結論。蒙古之不必依賴中國而能獨立存在，已經是自古皆然的事實。

但是人不得以歷史作藉口而想回復到歷史的某一點

去。歷史本是前進不已的。人或則承認歷史之動的原則 (dynamic principles) 而回復到歷史的某一階級去，或者另起爐竈去開始一新的階段。所謂一九一一年之革命並無多大成效，就是這個道理。蒙古人所企圖恢復的歷史動力，是循環的部族混戰以產生部族的統一，對中國作重新之侵略。這不唯是蒙古民族的「典型」歷史，也是東面滿洲民族和西面西藏民族的「典型」歷史。但這種動的回復已成爲不可能，因爲西方國家現在已經壓迫到中國和蒙古了，蒙古再不能毫無顧忌的任意侵略中國的邊地而害及西洋剝削中國的利益了。此外蒙古唯有兩種辦法：一則作爲帝俄侵略中國的先鋒，一則以社會革命的方式「清理」其自己的社會制度，因爲老制度已再不能執行其使命與任務——完成對內的過程，這是在滿清治下人工製造的穩定狀態中便已開始了的。

蒙古作爲俄羅斯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正與舊日的史實相符合。俄羅斯向亞洲的進侵早已開始，及至帝俄傾覆，東進失敗，實際上受其蔭護的外蒙古，遂亦不可避免的捲入了社會革命的漩渦中去。部族的王公既然僅只適宜於作進攻的領導，而現在的進攻又成爲不可能，結果唯有讓位於新的領導者。再者，僧侶的職務既與王公平行，又因蒙

古社會並無中等階級，新的領導者便只能出自平民。因此，如果說外蒙古社會革命的徹底與迅速是由於蘇聯的幫助，固然也未爲不可，但是如果說這種革命純係人工的輸入，卻與事實不符。這實在是蒙古社會中現實勢力之作用的自然結果。至於革命後的外蒙以及革命後的俄國聯合成功的新動力，是否僅只是封建的蒙古受帝俄的蔭庇而向中國侵略的變相，現在尙難斷定。

一九一一年外蒙的革命並沒有伸張到內蒙；內蒙的政治獨立之宣佈也未能成功。先是，王公以及僧侶並不危懼羸弱新生的中華民國。再者，他們又染指於中國貿易的利潤，一方還對俄羅斯的控制懷抱着一種朦朧的危懼。及至時間証明了民國雖弱而仍能以鐵路與現代武器進逼蒙古的時候，蒙古行動的時期便一去而不可復得了。西洋以及日本在中國和在蒙古的利益，都永不會使內外蒙聯合；於是蒙古的王公僧侶乃成爲蒙古失敗的造成人。中國的政策則在一方面維持其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又逼迫蒙古，使其年年放棄一部分的土地，作爲殖民之用。

內外蒙古之潛伏的社會衝突，由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滿洲而達到了最高峯。因爲內蒙一半現在已經爲「滿洲國」

所控制，所以蒙古人在中俄之外更須考慮其對日的內外關係。日本勢力自然須與俄羅斯勢力相對，擁護保守的分子以與革命的力量相對。同時又自須與中國的勢力努力競爭，期以轉移王公僧侶階級，使之重新興起而為民族的積極領袖；同時却作日本的聯盟而不再為分散不定的傀儡，致對中國的蠶食不能作有效的抵禦。

但是，如果王公僧侶的聲譽之恢復只是對於歷史某一點的靜底回復(Static return)，結果一定不能滿意，宛如在一九一一年的外蒙一樣。日本的勢力如想成功，便必須是動的(dynamic)，膨脹的。牠必須有充分的力量把被保護的貴族變作有統一希望的領袖；牠必是進向全蒙統一的真正鼓動力，否則便是無謂的虛張聲勢。然而統一的意義乃是繫於自由的聯盟，而不是屈服順從於一個異己的國家。因此種種，任何涉及蒙古的戰爭，其影響不僅及於中，日與蘇俄的勢力範圍而使蒙古民族僅僅作為無能為力的犧牲者；這更將是蒙古民族自身內的階級鬭爭。這種階級鬭爭的激烈程度，將因反動勢力在外蒙尚未完全殲滅以及革命勢力在保守的內蒙也並非全無存在的原因而加甚。

我實不欲牽強附會階級分析之說。但是我敢預測蒙古民族內部的衝突，一定會越法露骨表現為階級的鬭爭，

而且必須用階級的鬭爭的看法來解釋。與蒙古事件有關係的國家，也將越法顯明的出現為此一階級或彼一階級的護庇人。因此，即使是一個 *great*，他沒有特別受過以階級的見地來分析歷史以及文明與民族間之關係的訓練，可是也必須先去了解蒙古社會的階級基礎。

但是，此處同時也須指明，作用於蒙古事件之後的尚有一種強有力的歷史的力量在，這全與社會階級無關。此種力量即是全世界陸地勢力(Land Power)與海洋勢力(Sea Power)之平衡的更易。自有史起以至歐洲船舶第一次出現於中國口岸止，不但蒙古的事件，即中國以及現為蘇聯的廣大大陸地區的事件，亦莫不受陸地勢力的支配而決定。自哥倫布時代起以至十九世紀商業帝國主義之頡頏以及海軍之競爭止，遍全世界的決定因子則是海權；蒙古與中亞的重要性，即因此而遮掩不現。

日本向亞洲之猛進，中國開發邊疆舉辦建設的傾向，以及俄羅斯再起為世界強國之一，遂結束了海洋勢力的時期。歐亞二洲日益受到地理連續性的影響，而蒙古之所在正去東西兩極端的平衡點不遠。因此，在蒙古的社會民族衝突中，我們更可發現歷史動力之促進，期在歐亞間尋得平衡，努力適應於一個海洋期的結束與大陸期的開始。

黃山遊記

李書華

三二

黃山屬南嶺山脈，古稱黟山。相傳黃帝與容成諸人嘗至此採藥。唐天寶間改今名。山位於安徽歙縣之西北，太平縣之南；在歙縣境內者佔三分之二；在太平境內者佔三分之一。因其交通梗塞，遂與人世隔絕，罕有往遊者。唐李太白嘗一至其地，爲之徘徊而去。至宋時乃漸有往遊者。至明代遊者漸多；徐霞客兩度探奇，著成遊記，黃山遂更爲世人所喜道。馴至今日，交通便利，達黃山之公路共有三條：（一）由杭州至徽州（杭徽路），轉湯口；（二）由南京至蕪湖（京蕪路），經宣城至徽州（蕪屯路），轉湯口；（三）由安慶對面之殷家匯，至湯口（殷屯路）。前兩路早有公共汽車通行，故遊山之人乃較往昔爲多也。

余久慕黃山風景之秀美，屢思一遊，牽於人事，卒卒未果；然此志固未嘗一日去懷。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余應浙建廳曾養甫先生之約，與吳稚暉先生等參加杭徽公路開幕典禮，自杭至徽。本擬藉此機會，一遊黃山，嗣因當時由徽州至黃山脚下之湯口約六十公里（仟米）尚未修築公路，行程頗感困難。加以冬際晝短，氣候亦涼，乃未果行，悵然而返。

稚暉先生去歲曾遊黃山，歸來爲余道其勝。本年春夏之交，稚暉先生原擬二次往遊，約余同去，適先生方有川黔滇之行，竟成虛願。本年四月下旬，余因事由平赴京滬，適有七八日暇，乃決意乘此機會往遊。是時有與皖建廳劉式菴先生由京同往之議。旋式菴因事須回安慶，余遂決計由杭取道杭徽路，逕往黃山。綜計遊程，由杭州而徽州，而黃山，而屯溪，而休寧，而白嶽，復歸杭州，歷時七日。援筆記之，聊存鴻印，工拙所不暇計也。今先將此七日行程撮要如下：

第一日：由杭至徽，再轉黃山脚下之湯口，以達茅蓬，是夕即宿於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中；

第二日：由茅蓬，經慈光寺，半山寺，天門坎，至文殊院，是夕宿於院中；

第三日：由文殊院，登天都峯，蓮花峯，經天海，至獅子林，宿；

第四日：由獅子林，往遊清涼臺，始信峯，西海門，是夕仍宿獅子林；

第五日：由獅子林，經丞相源，雲谷寺，觀九龍瀑，

回茅蓬，宿於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

第六日：由茅蓬經湯口，至屯溪，經休寧，遊白嶽，

回屯溪，宿；

第七日：由屯溪回杭州。

此行計在黃山勾留五日。茲再逐日記載所見所聞於左：

第一日 四月二十九日

余於四月二十七日晚由滬乘火車至杭，寓於新新旅館。余前此來杭，約十數次。舊地重遊，無可紀述。是日在杭，遇任叔永先生。叔永固亦欲遊黃山者，余喜得伴同遊。不意於二十八日之晨，叔永來告，謂因事須即回平。余遂於是日在杭訪友，兼製雨衣，購食物，略作準備，決於翌晨獨往。

杭徽公路，余本已走過一次，係乘小汽車。此次擬改搭公共汽車，乃于二十八日下午赴浙公路局湖濱汽車站詢問。知由杭直達屯溪（經過徽州）之公共汽車，每日共有三班：第一次早七時開；第二次早八時半開；第三次早十時開。票價由杭至徽，每位為國幣六元零八分。得先一日購票。

二十九日晨，天陰。昨日曾微雨，今乃漸漸放晴。氣溫為二十一度（攝氏表計，下仿此）。余携氣壓表（高度表），

溫度表，指南針，照相機，及隨身衣物，乃於晨六時即到

湖濱汽車站。至六時半開始售票。旅客甚多，紛紛爭購，

售票處極形擁擠，余無法與之競爭。未幾，票門即閉。據

汽車站執事人云，七時車坐位已滿，現須候八時半所開之

車。余深恐第二班車坐客仍多，又買不到票，特到汽車站

問事處訂小包車一輛，由杭至徽，車價為四十三元七

角八分（中國旅行社及其他汽車站，聞亦可僱小包車，車價與此小有出

入）。稍遲小包車開到，車號為浙一八三七號。該車甚新，

且頗華麗，坐之亦甚舒適。車中可坐三四人，深以無伴同

遊，空此坐位，覺得可惜。七時半，由湖濱動身。至武陵

門，停十分鐘，乃復西進。

車經餘杭，臨安，化龍鎮（距杭七十公里），藻溪鎮（距杭

七十九公里），於潛；及至昌化（距杭一零八公里），天已大晴。

在此停車，余與車夫略進茶水，車夫復加汽油，預備前

進。（按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余曾與馬寅初先生等七十餘人，由化龍

鎮出遊東天目山。又於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與吳稚暉先生等八九

人，由藻溪鎮出遊西天目山。彼時尚須步行，或乘肩輿。今則由藻溪鎮至

天目之公路已築成；且天目已設有旅館，更為便利。昌化產鷄血石，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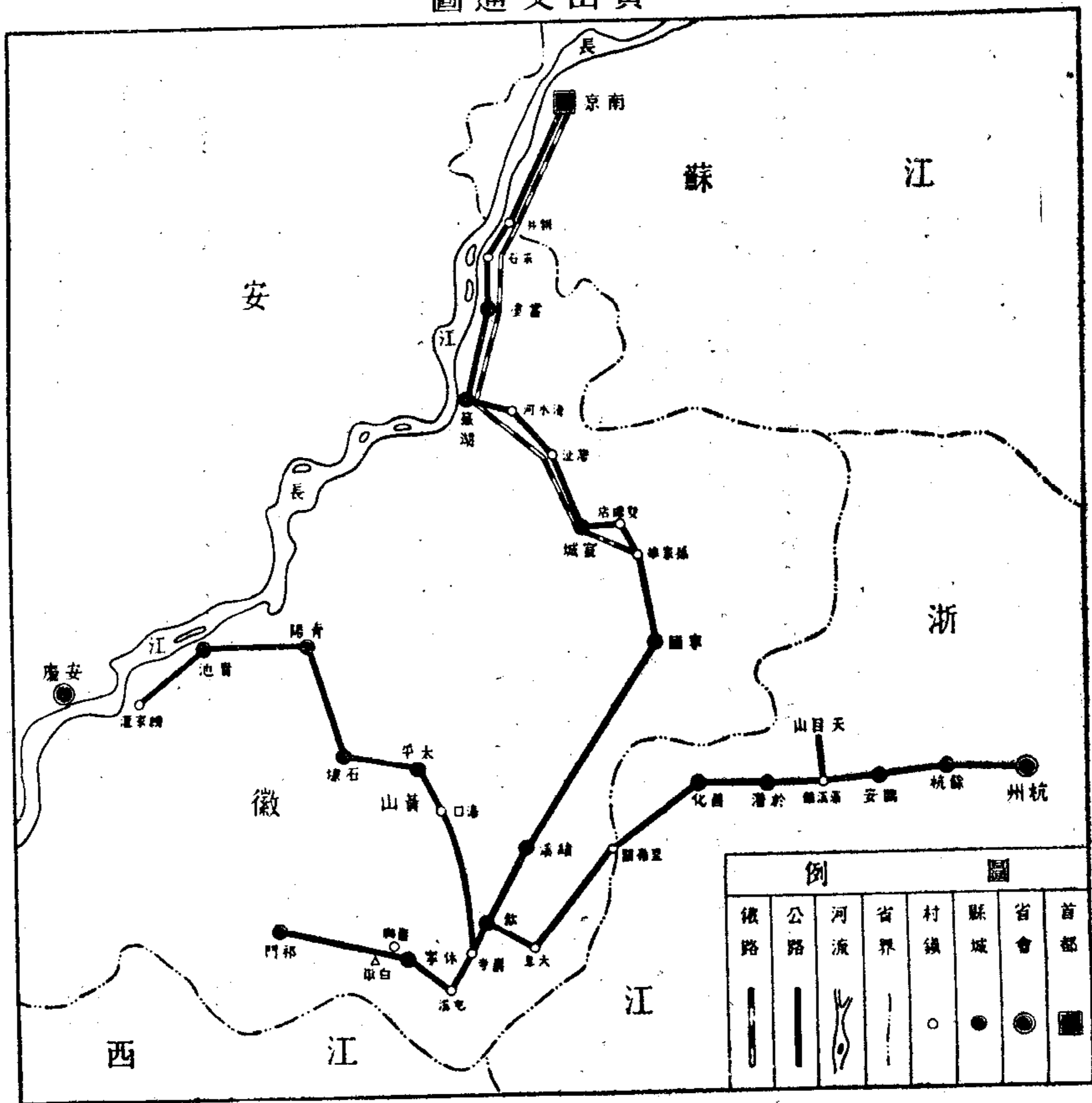
十一年十一月過此時，曾購鷄血圖章多方，價亦甚廉。）

在昌化停車約二十分鐘，復繼續西行。過浙境最後一

站，即子才站，警士向余索去一名片。過浙皖交界處之昱嶺關後，公路曲折甚多。過三陽站，路甚狹而坡度甚大，僅能容一車之行；故車行至此，須在汽車站候一方車開過後，對面之車始能開行也。是日正午十二時，抵徽州。按杭徽全路共長二一五公里，浙境長一五四公里，皖長六一公里，小包車僅行四小時即到。若乘公共汽車，則須七小時方可到也。杭徽公路，沿途多山嶺林木，風景絕佳。

徽州約高出海面一五〇米（公尺），余即以此為標準，用高度表測黃山高度。余到徽州後，由汽車站執事人代余僱妥由徽州赴黃山湯口之小包車一輛，價十七元一角二分。余在徽州汽車站休息約半小時，并就自携食物略進午餐，復於十二時半起身。車經徽州城外之太平橋，過太白樓，向西南行，即向屯溪前進。至巖寺站轉向北行，順殷屯公路，向黃山前進。少時入山口，兩面皆山，中有小溪可通小舟。公路即沿溪岸而築成，曲折甚多。午後二時抵湯口，其地高度四九〇米。湯

黃山交通圖



比例尺三十二萬分之一

口為一大村鎮，現住有兵士一營。

巖寺站東距徽州十二公里，西距屯溪十六公里；北距湯口五十四公里。巖寺至湯口現有公共汽車通行，每日僅往來一次。上午九時三十五分由巖寺開；上午十一時二十

四分到湯口。至下午二時三十分由湯口開；下午四時三十分到巖寺。每位票價一元六角。由徽州至巖寺，公共汽車每位票價三角。最可惜者則為杭屯直達之公共汽車，與巖寺間公共汽車之開行鐘點不能銜接，予遊人諸多阻礙。按由杭至湯口，本可一日直達；今如乘公共汽車，則非在徽住宿一夕不可。

余到湯口後，即僱一工人，為携衣包等物，隨余步行至山。過逍遙亭，其地高度六三〇米。舊亭已毀，今正重修。由湯口約行一小時，始至茅蓬之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經理張康侯君招待甚殷。此旅社成立不久，位置極適中，前臨深溪，後靠山傍。此中房間約分三等：每日租金五元者祇有一間，租金三元半者有四間，租金二元者有八間，皆洋式建築，異常清潔。社中早餐每人大洋二毛（吃粥），中餐及晚餐每人大洋五毛（米飯及中菜），價亦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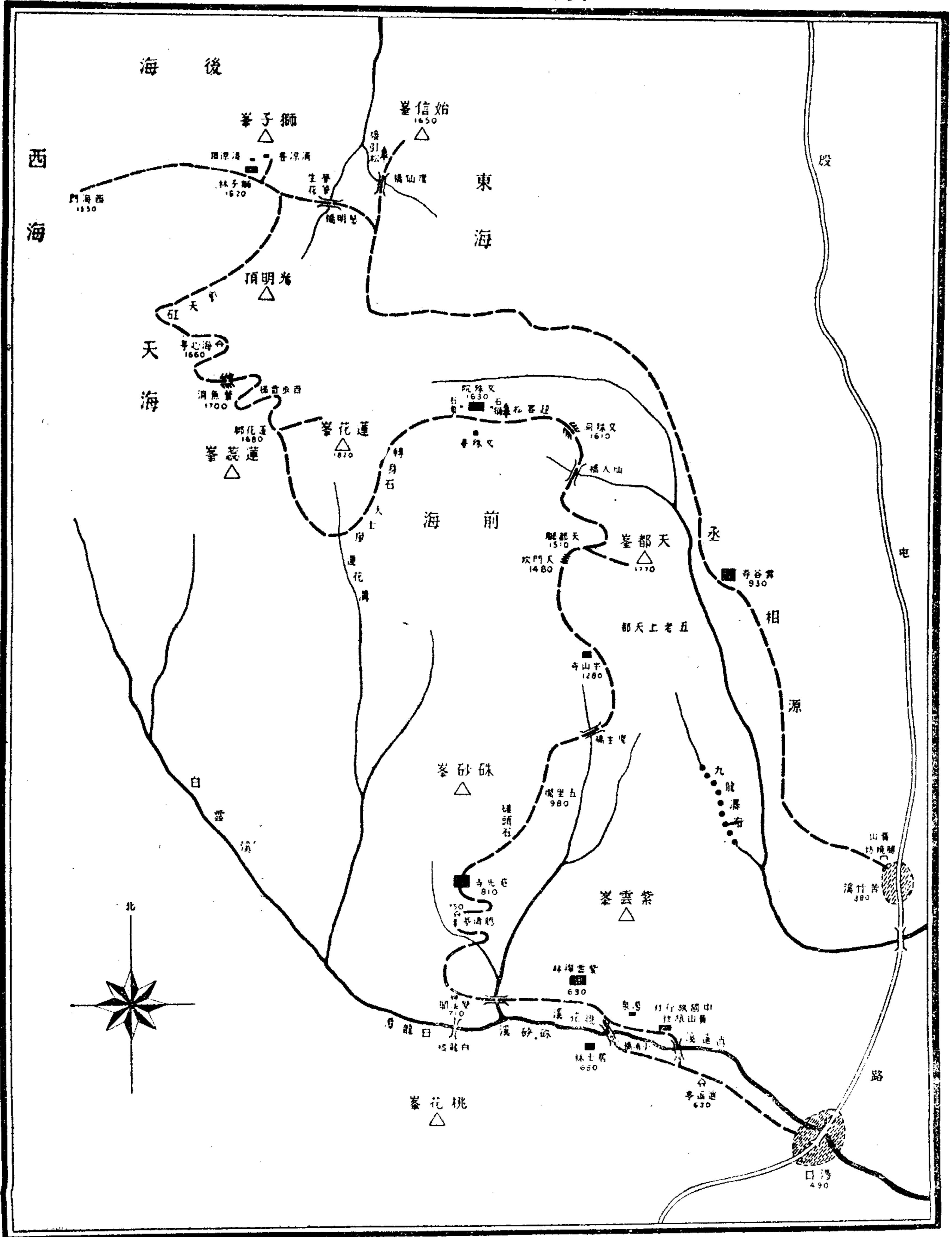
少頃，黃山建設委員會駐黃辦事處金慰農先生來訪。蓋曾接劉式菴先生電報，知余來此，故來招待。因與談遊山路程。彼又託駐黃辦事處職員過旭初先生陪余入山，藉為嚮導。旋慰農引余參觀湯泉，并遊茅蓬附近之名勝。

湯泉浴室分上下二層。上層類似客廳，下層則為浴室。浴池上為半圓石洞，下為長方形之池，其長約五米，

廣約三米，深約一米。池邊及底皆為石砌而成。水從池底石縫中湧出，時有氣泡浮水面，石壁罅中滴出少量寒泉，流入池中。（此寒泉之溫度，為攝氏十八度。）因此，湯泉之溫度為之降低。池水甚清，毫無硫磺氣味。池中溫水之溫度為四二度半。按余近年所到國中溫泉數處均各測其溫度，今合並附記以資比較：（一）北平溫泉三七度；（二）江蘇江浦縣湯泉鎮四池：甲池三九度，乙池四〇度，丙池四一度，丁池四五度；（三）陝西臨潼華清池四二度半；（四）北平湯山兩池：東池四三度，西池四九度；（五）廬山南溫泉（溫湯）五六度；（六）南京湯山五八度。今此池溫度，適與臨潼華清池相等。至湯泉之名，久為世人所知。唐刺史李敬方著有湯泉銘，傳誦人口。現在浴池上，刻有橫額「蒸雲」二字，旁有「熱不因人」，及「天然如意」等題字。浴室外大石上，有元至元十七年徽州人鄭玉子美題字，又有明嘉靖丙申五月朔馮世雍題石。浴池向不收費，惟須酌予茶房小費耳。古時本有上下二池，後僅餘一池。現於舊池旁又闢一新池，工程尙未竣也。

出湯泉後，過小楠橋，經居士林旁，沿溪而上，過白龍潭，潭水清深。余與旭初由黃山建設委員會新闢之路，登桃源峯，觀人字瀑，北望羣峯，歷歷如列屏山之左右。

圖略綫路程遊山黃



一 之 分 千 七 萬 三 尺 例 比

遠近多杜鵑玫瑰等花，燦爛眩目。桃嶺峯下，經黃山建委會定爲住宅區。下桃源峯，至居士林小憩。黃山建委會駐黃辦事處即設於居士林中。

居士林建築未久，林爲古祥符寺舊址，其地高度六八〇米。康熙時所修之黃山志云：『唐刺史李敬方作龍堂於湯之西。天祐（唐昭宗）九年，刺史陶雅建寺號湯院。南唐保大三年改靈泉院。大中祥符（宋真宗）元年，勅改今名』。又考高僧傳云：『此寺創於志滿禪師』，事在唐天寶間，故祥符寺爲黃山最古之寺。

是晚慰農招飲於湯泉浴室上層客廳中，酒肴甚美，主人招待尤爲殷勤。飯畢，即回旅社就寢。

第二日 四月二十日

晨七時起床，天晴，室中氣溫十五度。七時半浴於湯泉，舒適異常。浴畢回旅社，用早餐。此時旭初引一警士及一挑夫，亦至旅社中。晨八時三刻，余等一行四人步行入山，向文殊院前進。臨行時，旅社張經理告以獅子林和尚澄如來迎。余等遊興正熾，不願多遲，遂即出發。旭初善書法，尤喜吟詠，嘗伴段合肥圍棋，固一雅士也。此次遊山，尙携詩集多本，其風趣可知。

過紫雲禪林（即黃山第一茅篷，俗名茅篷。）其地高度六九

〇米。有新建之雙溪閣。再上爲聽濤山亭，其地高度七五〇米。亭門有『過此成仙侶，回來無俗人』之句。及至慈光寺，本擬小憩，適寺中方丈圓寂，因之中輟。考慈光寺爲明嘉靖間玄陽道人舊居。明萬曆間普門和尚來此建刹，始由道教改爲佛教。明神宗爲慈聖太后祈福，乃賜此名。寺在黃山中，尙稱第一大廟。其山門尙完整，惟大雄寶殿久已失修，無復莊嚴。其地高度八一〇米。

再進過碰頭石，至五里欄。石磴窄，登涉殊覺不便。策杖而上，尙不覺其過險（下部有石欄，中部無欄，上部有鐵欄）。石欄最高處高度九八〇米。上午十一時半至半山寺，其地高度一二八〇米。寺有小樓三層，乃許靜仁先生捐貲重修者。余等方在瞻仰間，澄如和尚已至。在此每人進麵食兩碗。寺僧正心贈余以野白朮及雲霧茶等物，聞係此山中名產。野白朮用糖煮食，據云可治百病。雲霧茶葉大且厚，能泅水至四五次尙不去味。

余等在寺少息，更鼓勇前行。是日天氣晴朗，四顧諸峯益覺奇秀。奇松怪石，愈高愈多。雖汗流滿背，亦不覺其疲倦也。將達天門坎，右望有『五老上天都』之著名怪石，偉然觸目。天門坎高度一四八〇米，兩崖夾立，頗似門形。對面仰視，即見文殊臺。由此循石級下而復土，

即達天都峰脚。高度一五一〇米。向右爲登天都峰之路，向左爲登文殊院之路。余等仰觀天都後，乃取左路先登文殊院。經過仙人橋（高度一五五〇米），一線天，文殊洞（高度一六一〇米），始至文殊院，時下午二時半也。其地高度一六三〇米。

文殊院係明時普門和尚所構，今已重飾，煥然一新。

尙有一小部分未竣工。院後依山，院前爲平地。南面有石如臺，名曰文殊臺。登臺東望天都，西望蓮花，兩峯之面目畢見。天都峯前有石類鼠，其狀似向天都跳者，故俗稱『老鼠跳天都』。又天都峯旁有方形一巨石，似橋，故名『石橋』。蓮花峯以形似蓮瓣故名。蓮花峯之側有圓錐形之峯，稱蓮蕊峯。文殊院之左，有巨石若獅，其右高坡上，有巨石若象，故有『左獅右象』之語。石獅旁有松，名『迎客松』，因其一枝甚長，若以手迎客狀，遂以得名。自茅蓬至此，本地人謂爲十五里。山路皆鋪石爲磴，行人愈登愈高，愈高愈險，愈險愈奇。松樹多生於石縫中，枝幹奇崛，或傾斜，或橫臥，怪態百出。登文殊臺，俯視絕壑，遠眺羣峯，使人愴然自得，歎爲觀止。昔人謂：『不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今乃信其非虛語也。

文殊院房中溫度，在下午三時爲十五度，至下午七時

半則降至十三度。院中住持普雲和尚有事赴慈光寺，故由澄如代爲招待。房中備有鋪板及被褥，被褥係樂善者所捐贈，遊人日多，故已不甚潔淨。院中爲備晚餐，有素菜六大碗及米飯，均尙適口。飯後即宿於院中。

第三日 五月一日

晨六時起，天氣晴朗。房中溫度十度，室外溫度較低。昔人謂：『黃山五月披裘』，實則高山上之氣溫皆低，五月披裘不只黃山已也。起後，即到文殊臺，俯看雲海，許多山峯於雲海之中微露峯尖，亦異觀也。旋與旭初用早膳，擬于本日登天都與蓮花兩峯。

天都者，意即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見錢謙益遊黃山記）。

此峯頗類圓錐形，由上而下，幾成垂直之石壁。而石壁原無路可通，攀登極險。古人登天都而見諸記載者，有普門僧，雲水僧，李匡台，方夜，徐霞客等，外此殊不多見。吳稚暉先生遊山時，曾捐資開闢石塔，由下而上，鑿石作磴，近始完成，余名之曰『吳公雲梯』。自是人跡罕至之地亦可登臨矣。吳公雲梯鑿成後，汪夫人陳璧君女士及褚民誼先生等均曾一登此峯。

天都蓮花兩峯之高低比較，向無定論，而各種載記中則多以天都高於蓮花。黃山舊志云：『天都又黃山最高

峯；下視諸峯，直兒孫耳』。太平縣志云：『峯之可登者五六，蓮花峯光明頂其高者也。最高者莫踰天都』。汪澤民遊黃山記中云：『其尤高者，天都峯也。上多名茶。來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峯頂』。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峯，曰三天子都』。他若黃克謙述湯寺僧言亦云：『此峯頂猿鳥不到』；黃山舊志云：『天目高一萬八千丈，僅及其肩』。此外謂天都爲黃山最高峯者尙多。直至今日，遊人及本地人士亦莫不以此等說爲然。推其原因，不外此峯險峻難登，人跡罕到，遂稱之爲最高也。惟方夜黃山小遊記有『蓮花獨尊』之語。方一藻黃海記略亦有『踏蓮花峯，巍聳直出天都上』之句。而徐霞客遊黃山後記亦有『蓮花獨出諸峯上』及『即天都亦俯首矣』兩語，則明認蓮花高於天都矣。

古人對於方向，距離，及高度，頗少正確觀念。如由某地向某方向行若干里至某處之一類記載，其方向距離有時均錯，至對於高度一層，更少精確者；彼等所言，有時離開實際直不可以道里計。即如圖經載有黃山高一一七〇丈，歙郡志却謂：天目山高一八〇〇丈，而低於黃山，竟解釋爲天目近連浙江，地勢傾下，歙居上流，平地已與天目齊。至今視之，自屬可哂。世界上絕對無高一八〇〇

〇丈之山。喜馬拉雅山之耶維樂斯峯爲世界最高之峯，其高度爲八八四〇米，約合二八三〇丈（營造尺）。吾人今知天目山高約一五五〇公尺，固較黃山爲低。至歙之平地，則較杭之平地高出約百餘公尺而已。故在黃山未經正式詳測之前，余甚欲一較天都與蓮花之高低也。

余與旭初澄如等六人於晨八時五十分由文殊院向天都出發。經文殊洞，一線天，仙人橋，下石磴，乃至天都脚仰首望峯，即登吳公雲梯。按此雲梯石級長約二尺，高可七八寸，或至一尺。在一大段石級上有土級一段；土級較爲易登。過石橋，其地高度一七三〇米。經過數處轉灣，路乃極狹。有時遇垂直石壁，每石級竟高尺餘，旁臨深澗。吾人以手攀壁，蛇行而上，無復敢回顧者。若達峯頂，須經巨石脊。此石脊現已鑿平，長可丈餘，寬僅約一尺，其兩面均爲深壑，名『青魚背』。人行其上，旁無可依，絲毫不敢左右顧。過此須由小樹叢中穿出，乃達峯頂。余等至峯頂時，已上午十時矣。峯頂爲巨石所成，石上刻『藥師琉璃光佛』六巨字。又有谷同登君刻詩一首。在此峯頂，遙望慈光寺，茅篷，湯口諸地，尙可辨認。此時也，余以高度表測之，天都峯頂高度爲一七七〇米。余并在此絕頂上置一大碗，滿盛白水，使一眼在碗後

與水面齊，沿水面之延長線（水平線）對準蓮花峯頂測視之，則見蓮花峯頂尚高出於此水平線一段。以是知蓮花峯必較天都爲高。此本吾國木工定水平之老法，雖極簡單，固甚科學也。當時并請旭初及其他諸人一一測視，結果相同。再以此法測視光明頂，則知其高度與天都峯略相等。其他各峯則全低于天都矣。

在天都峯頂勾留約四十五分鐘，于十時三刻復經原路而下。俗諺云『上山容易下山難』，况天都奇險，爲更難乎！故余儘力保持自身之重心，不敢絲毫大意，卒安抵天都脚。十二時回抵文殊院，即用午飯。古人所謂『三日達峯頂』者，今余等往來不逾三小時，亦足以自豪矣。

午餐後稍休息。下午二時一刻，起程登蓮花峯。從文殊院西略行數十步，順石磴下行，再折而上，經蓮花溝與大士崖，路途曲折，與天門坎至文殊院之路略同。若與上午所登之天都吳公雲梯相較，則又不啻康莊大道矣。至蓮花峯脚，其地高度一六八〇米。此峯脚有二路，向右之路可通蓮花峯，向左之路則通獅子林。余等步登絕頂，中經四洞。第四洞上口高度一七七〇米，已與天都等高。比至蓮花峯頂，已下午四時。余以高度表測此峯頂高度，得一八二〇米，較天都高五十米。從前李寅恭先生所測蓮花

峯高度爲七〇〇英尺，合二一三〇米，恐未免過大。而丁在君，翁詠霓，曾世英三先生所編纂中國分省新圖，注明黃山高一四〇〇米，又恐未免過小。余所測蓮花峯高度，約在上列二數之間，故可認作較爲近似。又從前積溪程敷鑑先生繪黃山平面圖（非實測者），言蓮花峯高出海面五六三〇尺（營造尺），合一七三〇米，蔣維喬先生遊黃山會測蓮花峯高一六〇〇米，則尙均較余所測蓮花峯高度爲小。用高度表測高度，因氣壓變化，結果本可稍有出入。他日精測黃山地形圖時，高度之正確數目方可揭曉也。余又用水碗滿盛白水，順水面測視天都及其他諸峯，均不能見，尤可證明蓮花最高。蓮花峯上有刻字數處，峯頂平坦，廣約一二方丈，若一石臺然。適天氣清朗，踞石俯視諸峯，如在膝前。古人云『一覽衆山小』，此峯足以當之。至天都蓮花二峯，高低比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而余於此行，且在一日之間，得以解決，不禁狂喜。

下午五時一刻，下蓮花峯，回至蓮花脚西行向獅子林前進。過百步雲梯，其上端高度一二五〇米。百步雲梯有石級約百餘層，護以欄杆，昔稱險路，今不難行矣。百步雲梯之下，爲裏蓮花溝。溝內許多玉蘭花盛開。因憶京滬玉蘭花開，約在國曆三月中旬；北平附近玉蘭花開，約

在四月上旬。而此地開花，時期較北平遲一個月，較京滬遲一個半月。高山與平地之氣候不同也如此。

由裏蓮花溝再折而上，爲鯨魚洞。其下口高度一七〇〇米。上至鯨魚背，其地高度一七五〇米。乃到天海。天海實即山上一方較平坦之地，廣約數十畝。天海以南者，名前海。天海以北者，名後海。山而以海名，乃因「雲海」之故。自慈光寺以上至鯨魚洞，山嶺均係巨石，爲花崗巖，多奇峯怪石；滿山樹木，怪松尤多。及至天海，始得見有平坦之沙石土地。聞古時天海樹木甚多，漸漸斫伐，今已無一株之存，殊可惜也。天海中有破房一間，題曰海心亭，其地高度一六六〇米。立於亭前，可見「鯨魚背金龜」之怪石。

晚七時二十分，抵獅子林，其地高度一六二〇米。獅子林爲明一承僧所建，在獅子峯前，清涼寺下，正對萬松山。獅子林旁從前多松樹，後被火燒毀。萬松山中，古時松樹亦多，今被斫伐，殊深可惜。寺中住持維清，亦赴慈光寺。澄如由文殊院同來，任招待。晚飯後，即睡獅子林中。待客被褥與文殊院略同，亦樂善者所捐助也。

第四日 五月二日

是晨，天微雨。房中氣溫十一度。本擬預備明日由丞

相源步行回茅篷，今有雨，深恐明日不能趕回，又聞丞相源路較易行，可坐轎，乃遣挑夫老王回茅篷，訂肩輿兩乘，令其今晚即到獅子林，以備明日余與旭初乘坐。早飯後，看「麒麟松」，「鳳凰柏」，復往遊清涼臺。出獅子林，左轉登山坡，約百步即抵清涼臺。臺形長方，孤立突起，遠眺北海諸峯，氣象萬千。下清涼臺後，往觀清涼頂，亦係新修之廟。出廟後，向東南行，往遊始信峯。路左遙見「夢筆生花」怪石，及對面之筆架山。夢筆生花乃直立高出之圓石柱，尖銳秀聳，恰如筆形；松生尖上，奇特異常。過慧明橋，折而上。過渡僊橋，橋係在兩崖之間放一石板，以通行人。橋旁有「近引松」一株，過此即達始信峯。峯頂之翠臺，高度一六五〇米。由獅子林至始信峯，步行約二十分鐘即可到。在此東望石筍，秀峯上挺。所謂始信峯者，即云到此始信有此奇景也。獅子峯與萬松山以西稱西海，以東稱東海，合前海，後海，天海，爲黃山之「五海」。正午回獅子林午飯。

下午四時往遊西海門。由獅子林向西走，步行半小時即到。從前由獅子林至西海門，滿地爲野竹叢樹荆棘之屬所蔽，無路可通，故無法往遊。自吳稚暉先生捐貲開闢一路，行者稱便。此路僅石級一小段，餘爲土路，尙平坦。

吾人可稱此路爲稚暉路。路之終點爲西海門。此地爲一平臺，廣可二畝，前臨深淵，有千米以上之深度。西海門高度一五五〇米。遙望西海山峰有十三四層之多，其近西海之峰碧色宜人。其石之奇，松之怪，絕非他山所有。石松之奇異，較諸文殊臺，清涼臺，始信峰，尤有特別獨到之處。徘徊甚久，不忍遽去，至日落始由稚暉路回寺中。晚七時，挑夫老王歸，叫來之肩輿亦到。晚飯後，就寢，視溫度表知房中氣溫爲十二度。

第五日 五月二日

晨七時起，天晴。余與旭初相商，擬于今日晨往後海遊松谷庵，再回獅子林；下午取道丞相源，經湯口折回茅篷。嗣因路程過長，時間所限，乃罷。松谷庵之遊惟有俟諸異日耳。

早八時動身，向東南行，余與旭初乘肩輿。過始信峰旁，緩緩下山，石階甚多，故行路亦不易。聞此山路係新築成者。晨十時至丞相源之雲谷寺。其地高度九三〇米。寺中祇一僧人。相傳丞相源爲宋丞相營菴處。雲谷寺則爲明萬曆間萬安和尚所創建，現爲黃山建委會駐黃辦事處所重修，以備遊客之寄宿。余與旭初在此，各食湯麵一碗，精神爲之一振。此地風景本自不惡，但較諸前昨三日所

見，乃覺其平平無奇矣。

十時五十分動身，行四十五分鐘，到九龍瀑對面山坡。高度六三〇米。余等在此觀瀑布。瀑布於數百公尺或一千公尺之上飛奔降下，聲大如雷，水滴遠濺，色似白銀。瀑折爲九，下流入潭，潭亦爲九；水聚潭中，潭滿溢流。以視廬山三疊泉之勝，無多讓焉。

再下達苦竹溪村，其地高度三八〇米。出山路口有一石坊，題『黃山勝境』四字。青陽及太平至湯口及徽州之公路即經此地，亦即殷屯路之一部。轎夫等在此用午飯，余與旭初亦略進鷄子及點心。順公路南行至湯口。下午二時十分回抵中國旅行社黃山旅社。隨即偕旭初往訪金慰農先生，告以遊山情形，並告以測驗蓮花峰高于天都峰之結果，慰農亦爲之大悅。旋到湯泉沐浴，數日以來滿身污垢得以洗淨，頓覺身心清爽。

回旅社少憩，旭初來訪，告余明日將由黃山建委會駐黃辦事處之汽車送余下山；並商定由湯口經巖寺，過屯溪，休寧，往白嶽一遊，然後回屯溪宿。

黃山轎夫挑夫向有一定之工價，每名每日國幣八角。其飯食則由旅客供給。至於旅客遊山，寄宿廟中，一切食宿既由廟中代備，客人但須酌予香資而已，數目多寡寺僧

亦不斤斤計較也。自旅社赴湯口轎夫挑夫，每人一次之工資則爲國幣四毛。

第六日 五月四日

晨起，用早餐。天晴。即於早七時仍偕旭初乘肩輿赴湯口。辦事處之汽車已在湯口相候。早八時開車。同車者除旭初外，尚有黃山警察所洪所長。洪君係因事赴休寧，同乘此車。十時至巖寺；再西行，十一時到屯溪。其地高度一八〇米。

屯溪屬休寧縣，爲皖南重鎮。皖南本安徽富庶之區，所產茶米皆集於斯，商業原甚發達，惟近來頗呈凋蔽，已不似從前之繁榮。余在屯溪飯店預定房一間。午後與過洪兩君仍同車赴休寧。洪君在休寧下車後，余與旭初復乘車西進，下午二時一刻車抵巖脚。由巖寺至屯溪十六公里，屯溪至休寧十八公里，休寧至巖脚十四公里。

下車向南步行，過石橋，橋之兩端即爲巖脚村。過橋西行，出村後左轉至步雲亭，爲白嶽脚下，有『天下第一名山』匾額及『齊雲仙境』碑。白嶽亦稱齊雲山。徽州人若以黃山與白嶽合稱時，曰『黃嶽』；以白與黃相對稱嶽者，尊大之詞也。循石級而上，至松林亭，其地高度二九〇米，有大松二三十株。再上經望仙亭，至一天門，其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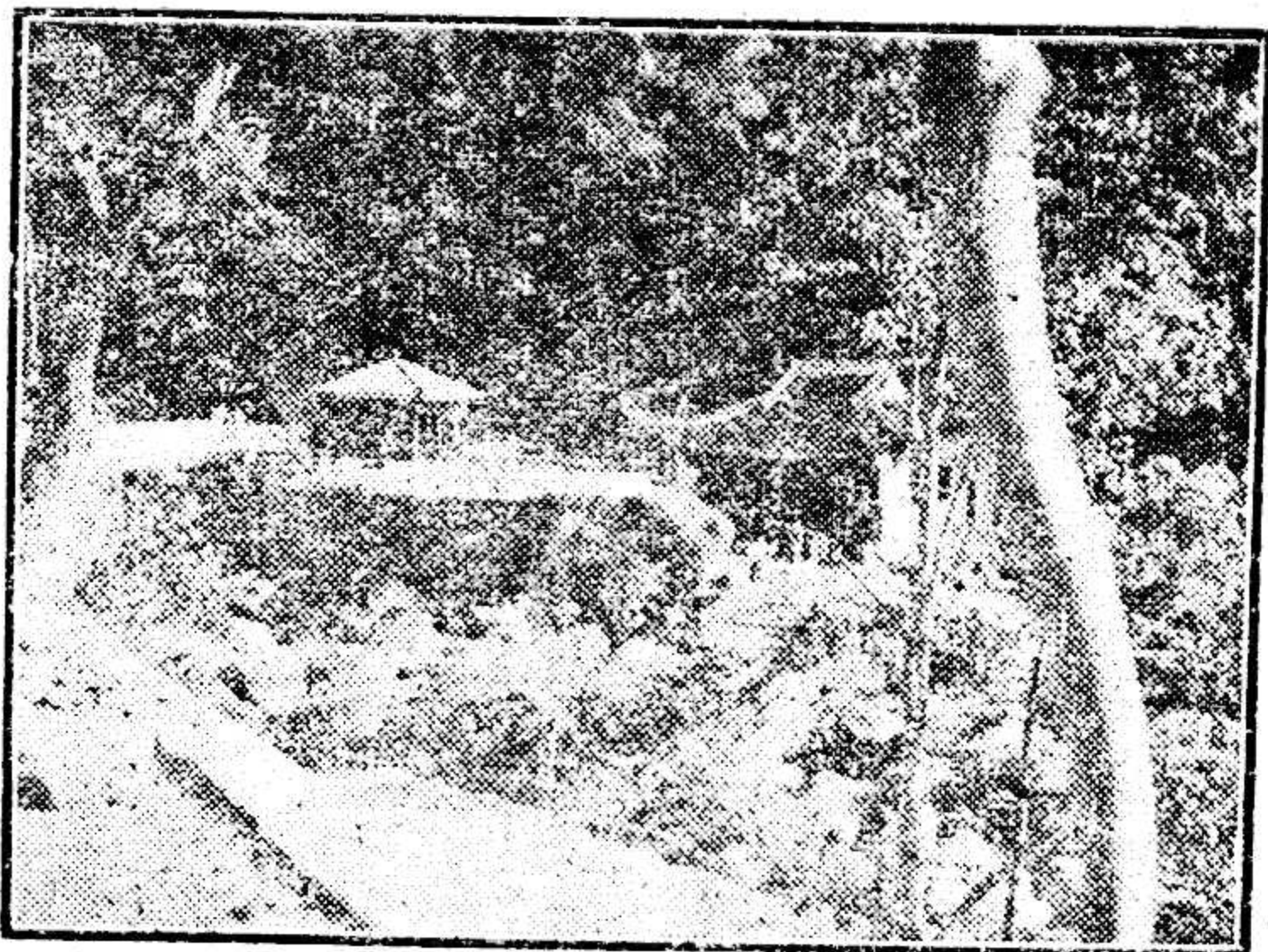
高度四九〇米，石碑甚多。進一天門，爲一洞天，洞甚多，洞中佛像皆爲石造者。諸洞中以羅漢洞爲最深且黑，惜未探其深度究有若干。過二天門，至白嶽新廟，正殿屋瓦爲綠色。余等往東陽道院吃茶，其地高度四九〇米。因時間關係，不能登山之絕頂，老廟及五老峯無從遊覽矣。白嶽風景自有其特點，然必欲以之與黃山相抗，則覺其不度德不量力也。聞白嶽七八月間香火甚盛，全山道士有百餘位，多屬婺源人。此時正值收茶時期，皆歸里收茶，故余等來此竟未見一道士也。

旋循原路下山，回至巖脚，時下午五時半。乘原汽車歸。因須過休寧接洪所長回屯溪，遂得在休寧晤安徽第十區石柱國專員，與之略談黃山之勝，即與過洪兩君暨祁門稅局胡孟栢局長同車回屯溪，即同用晚飯。飯後，余與洪君歸屯溪飯店下榻。屯溪飯店位於屯溪繁華之區，終夜喧譁，余幾一夜未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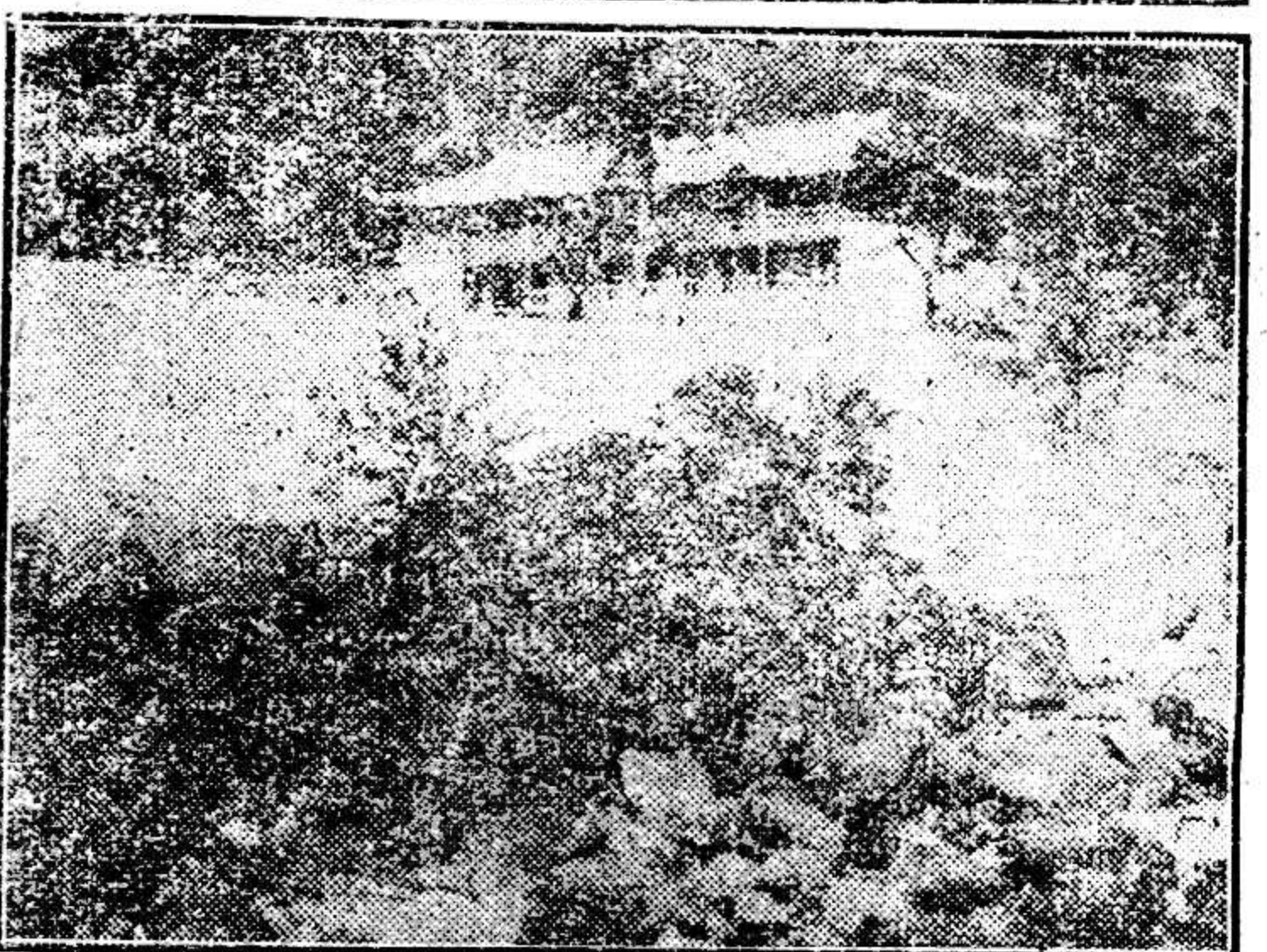
第七日 五月五日

晨六時起床。天晴。七時即到汽車站，搭第一班公共汽車回杭。過洪兩君均來送行。晨七時半開車，八時二十分到徽州。旋過皖浙交界處，浙境子才站，車停，檢查行李。余以一名片給檢查之憲兵，得免開箱之勞。下午四時到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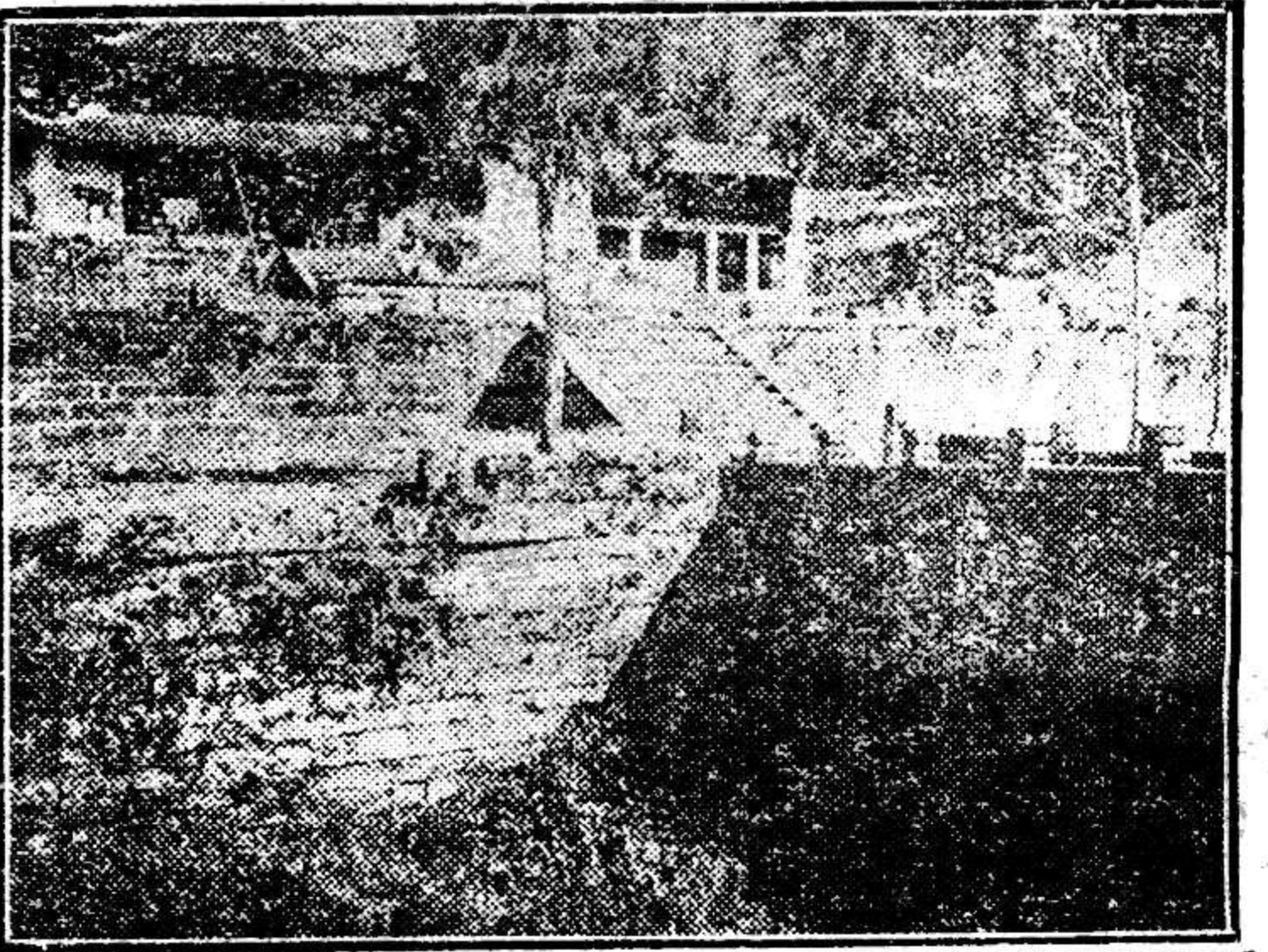
黃山湯泉



黃山居士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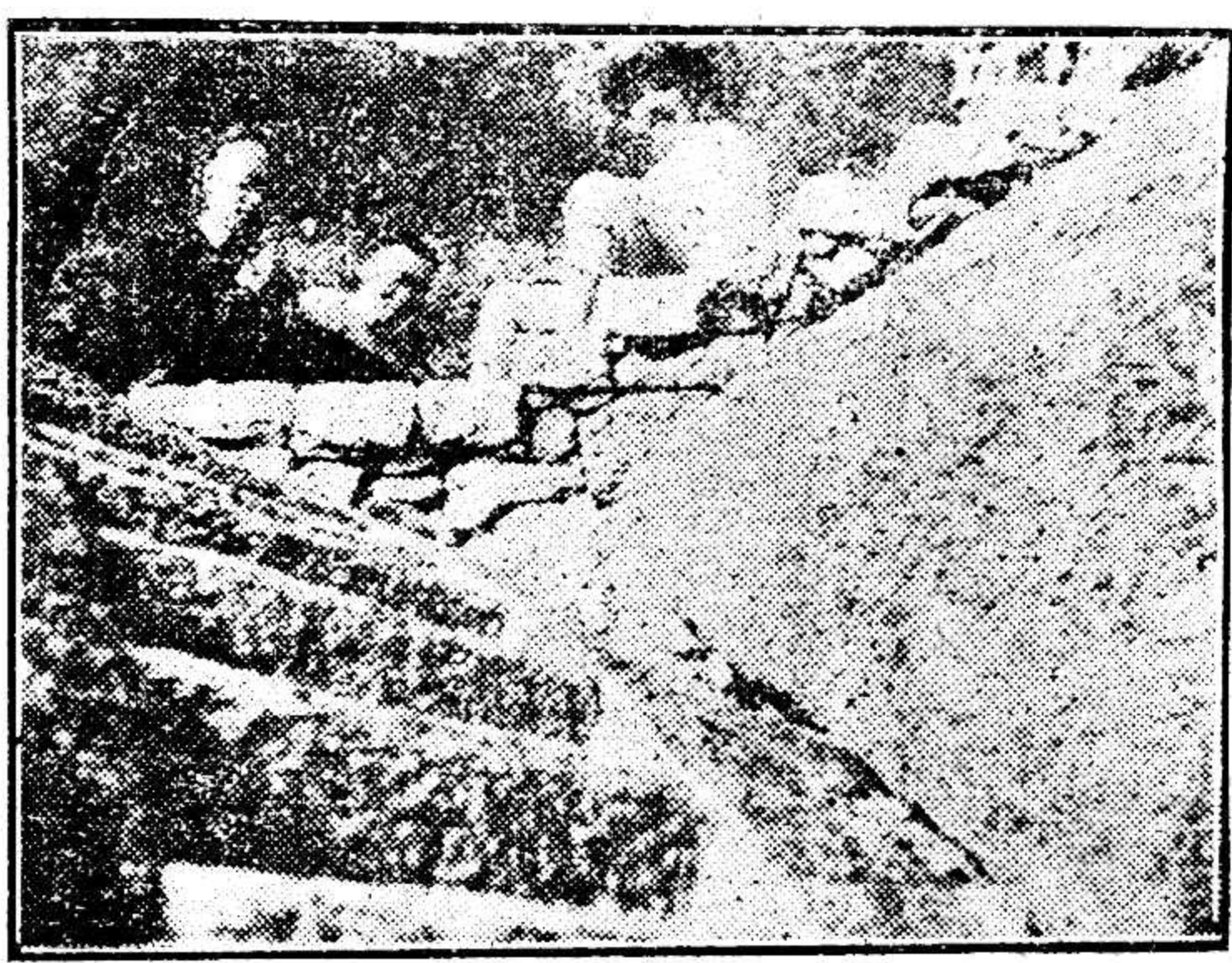
黃山慈光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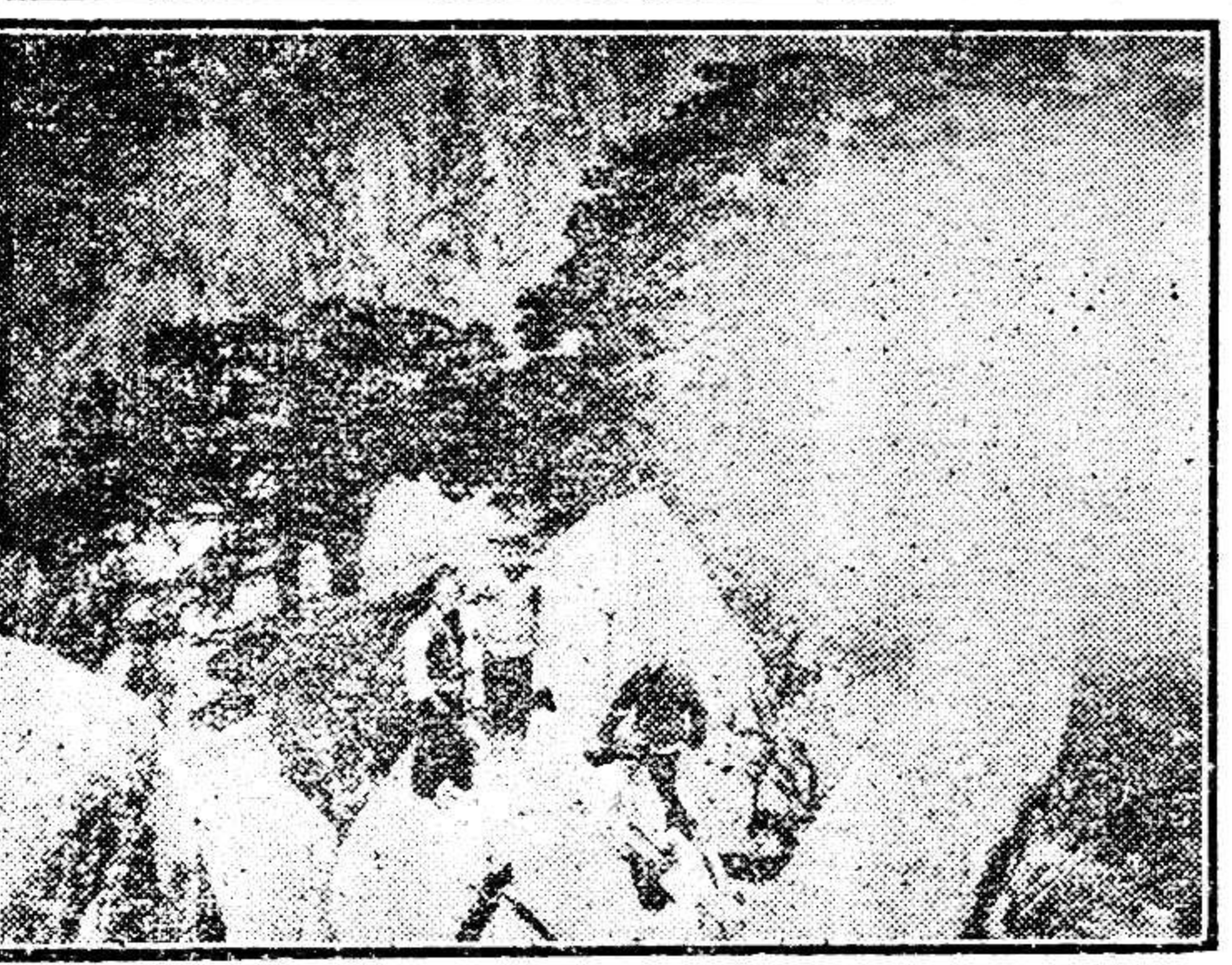
黃山天都峯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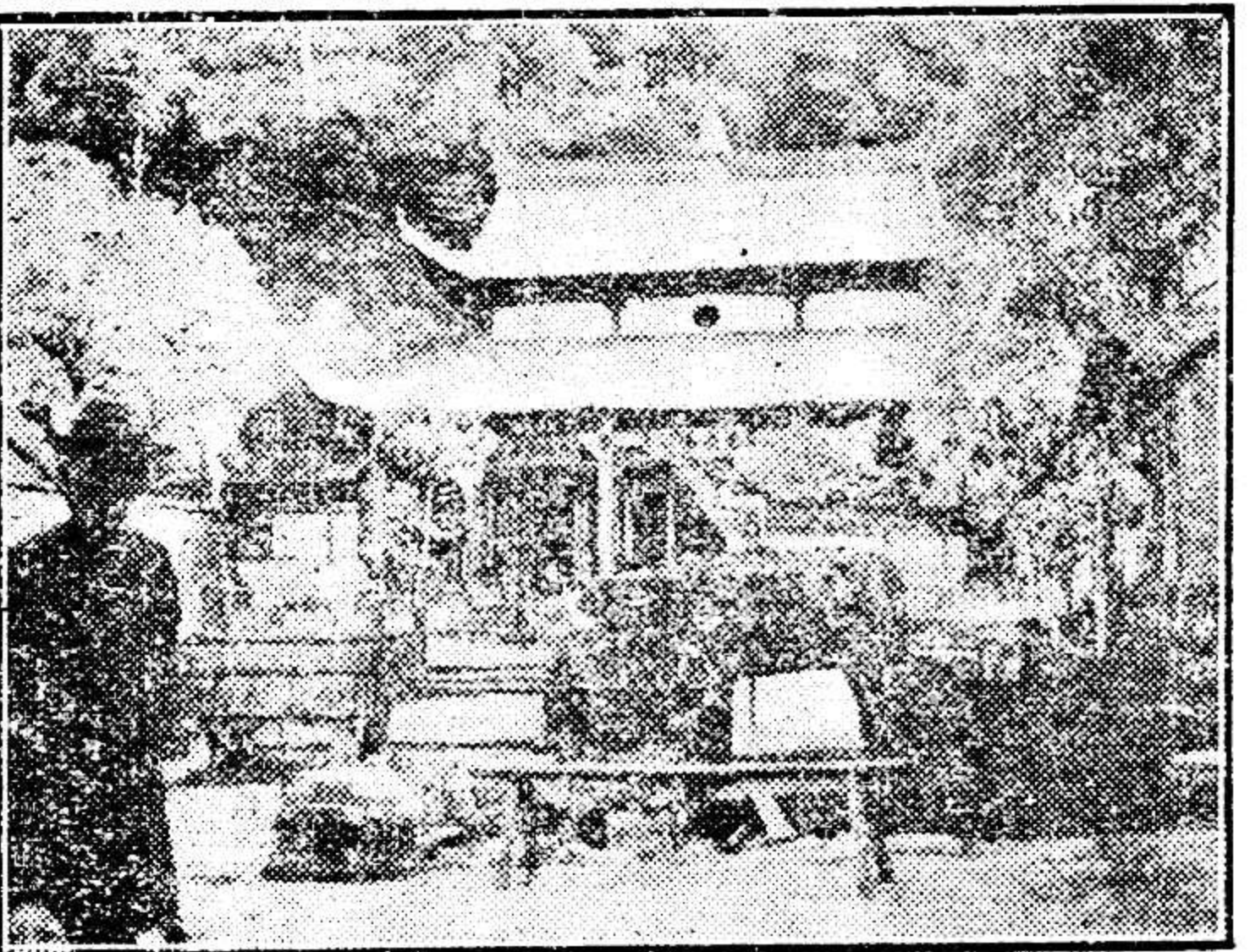
黃山蓮花峯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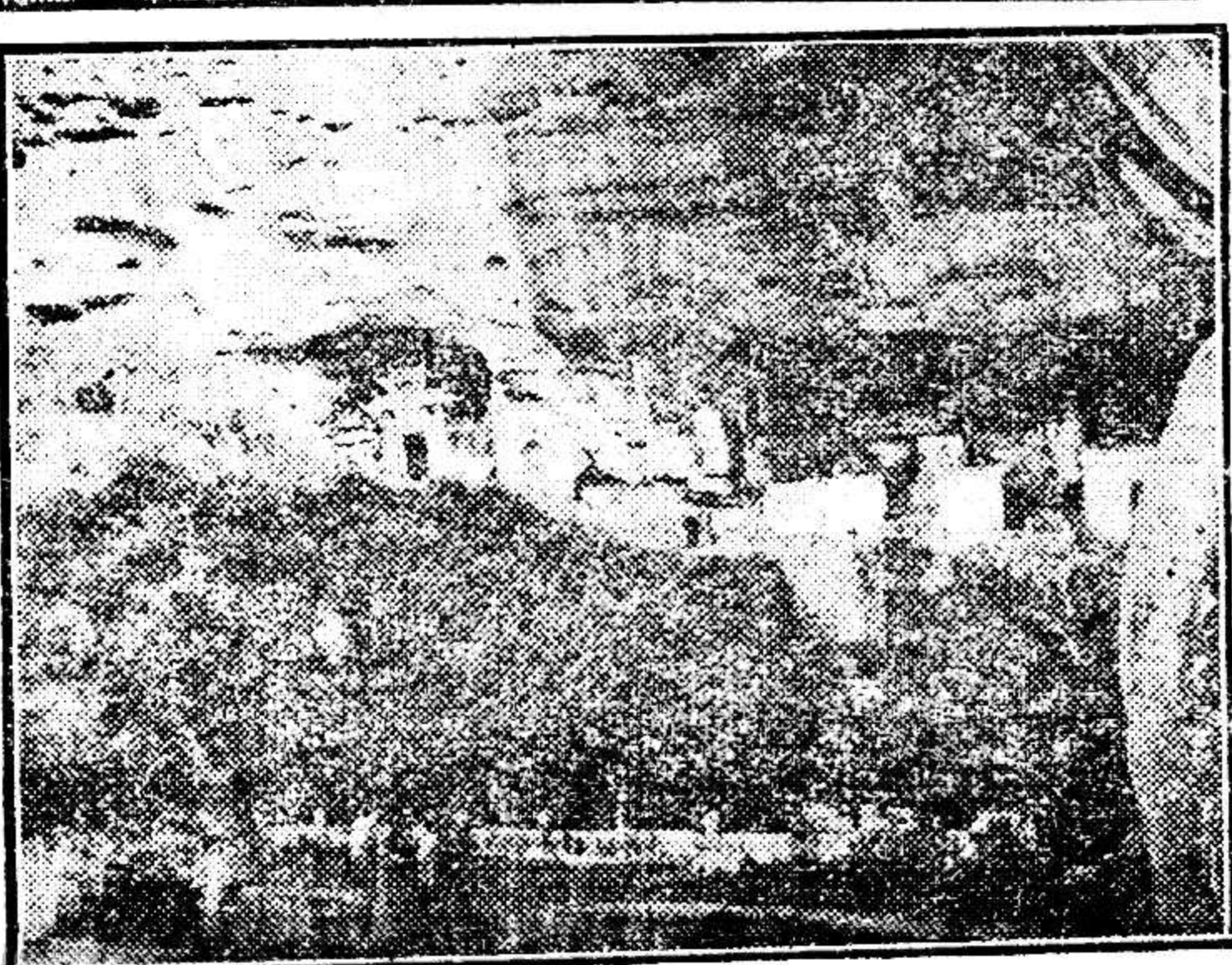
黃山蓮花峯頂



白嶽新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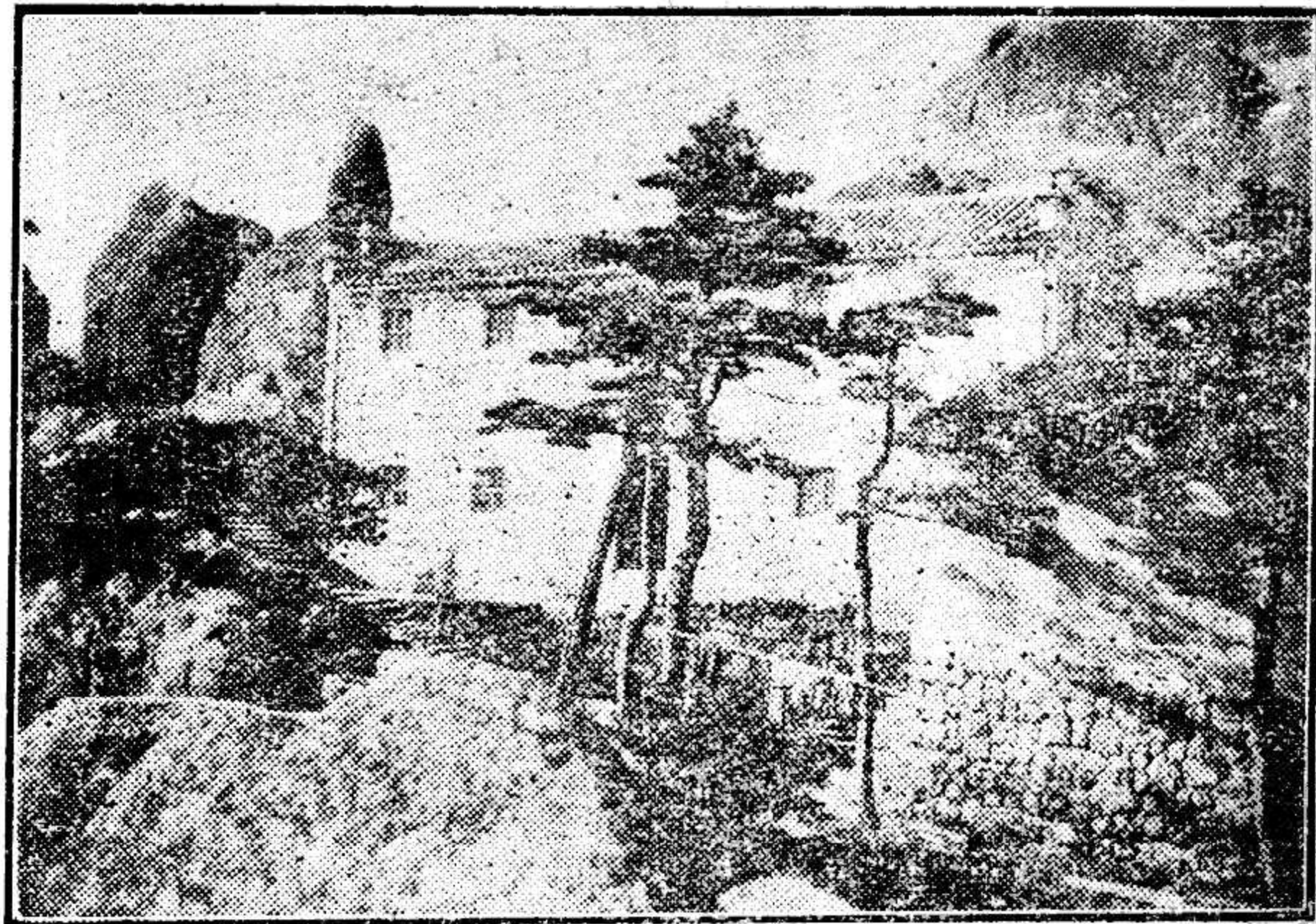


白嶽一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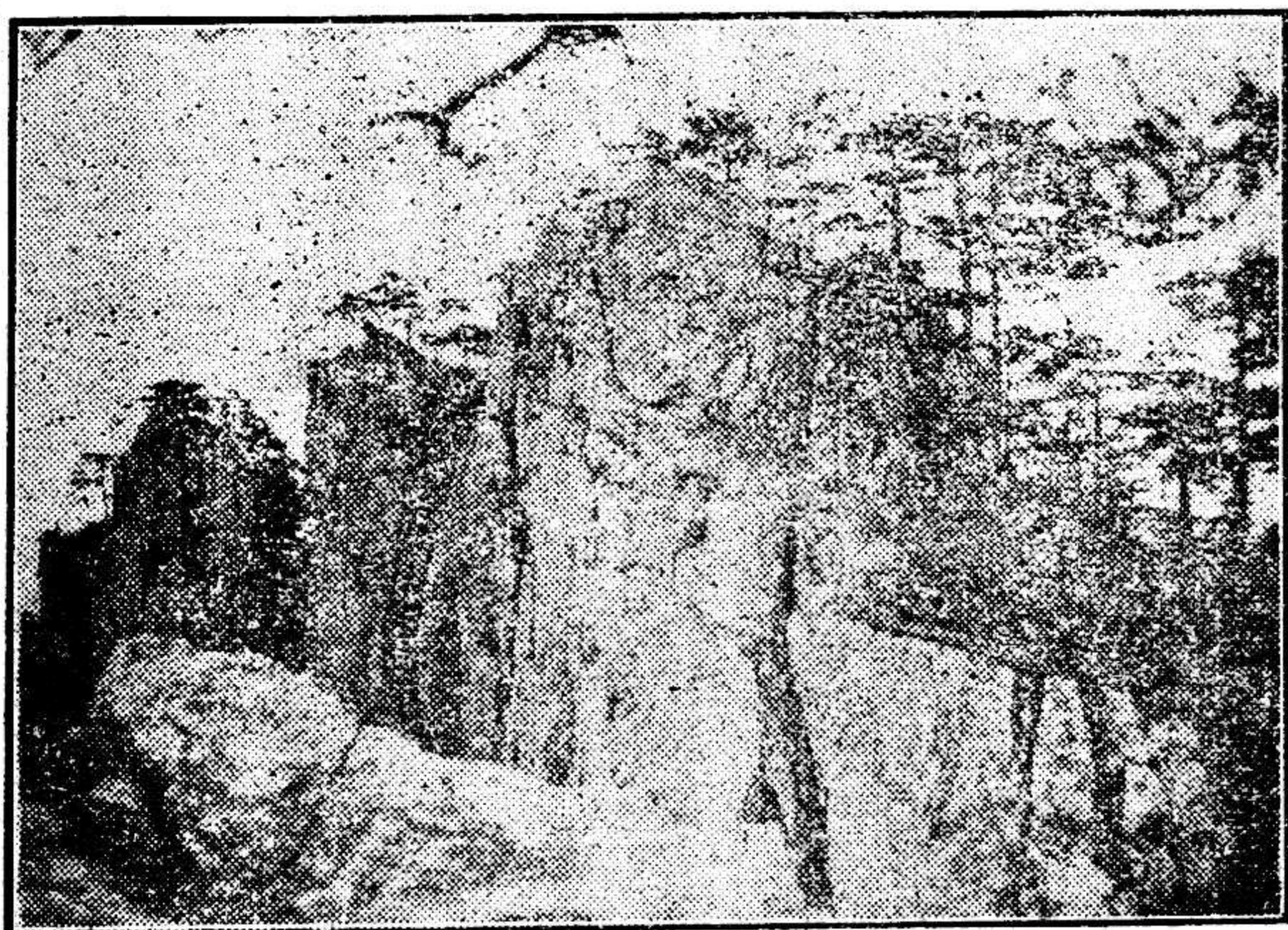




黃山天都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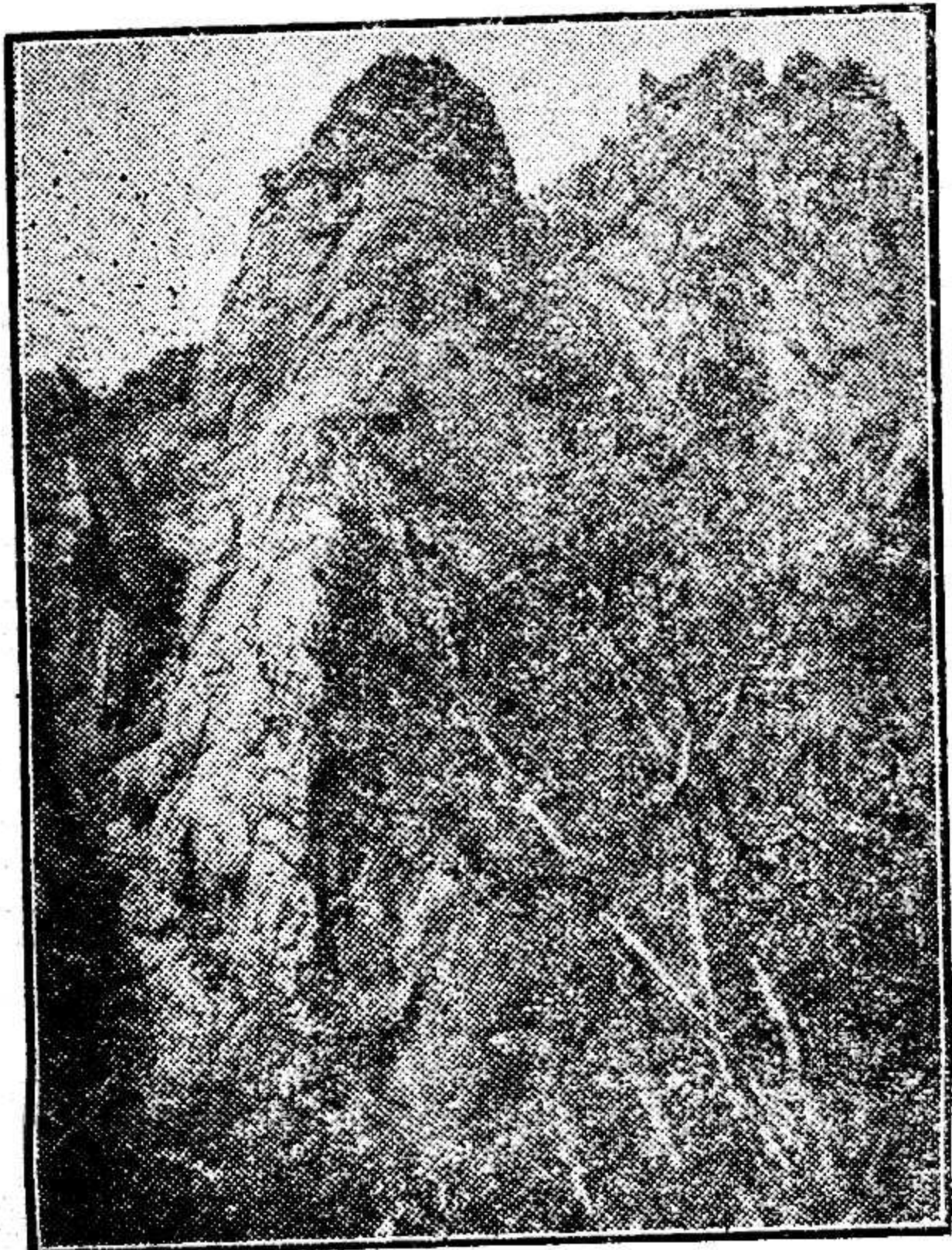
黃山文殊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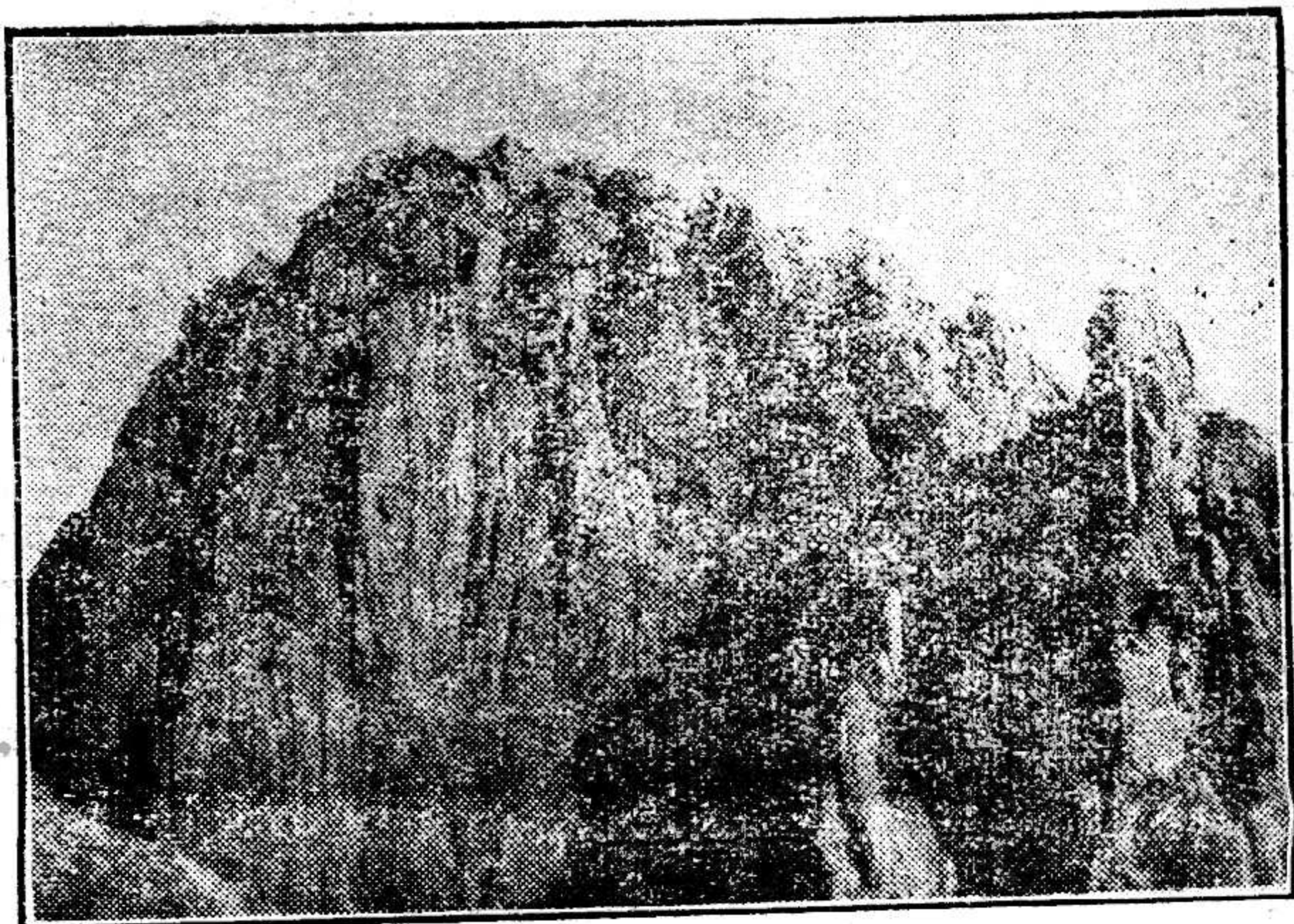
黃山始信峯對面風景



黃山蓮蕊峯



黃山蓮蕊峯(左)蓮花峯(右)



黃山蓮花峯

結論

黃山全境，面積至大。余遊覽五日，其有名之重要地點雖得一觀，然未遊之處正多。此五日之中，除五月二日在獅子林遇微雨外，餘均天氣晴朗，絕無雲霧，故看得黃山之真面目較爲清楚，亦云幸矣。竊謂凡山之優點，須有下列數端：（一）須高；（二）須深；（三）須多樹；（四）須多水；（五）須全部或大部分爲石質構成；（六）須有其他之特長。黃山高而且深，滿山林木，尤多怪松。溪水甚多，且有九龍瀑之勝。山中湯泉尤屬特點。全山屬火成岩，全爲花崗石所構成，且到處多奇形之石，土質極少。至其他之特長，可以『雄壯奇秀』四字包括之。凡此種種優點，黃山兼而有之矣。余所見國內名山，如：泰山，華山，衡山，廬山，天目山，勞山等似皆不如黃山之完備。瑞士山水稱爲世界第一，二十年前余亦曾往遊。然余個人覺瑞士山固極偉大而秀美，然不如黃山之奇。夫山之面目各有不同，亦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故山之與山自難相較。然黃山實集諸山之大成，爲他山所不可及。至其佳點，尙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登此山雖稍廢時日，且不免有跋涉之苦，然苟有志於探奇攬秀則不可不至。其所得之代價，實有足酬此苦者。昔人謂：『五岳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

亦可知其價值矣。

黃山開闢較晚。不外以下諸因：路險，崎嶇難行，使人聞之生長，肩輿不能上下，非足健耐勞之人不能任此長途奔波，一也。寺廟既少且小，設備又簡陋，食宿諸多不_宜；從前往遊者均須挑行李，携食物，深覺其費事，二也。由京滬杭各地往遊，輒須經過四五日至十日之水旱路程方能達到山脚，交通梗塞，遊人裹足，三也。今日情形則與昔時大異，諸種設施使遊人感覺方便之處日增。如山路大半鋪石作磴，或鑿石成級，均可上下通行。除登天都峰路險難行外，其餘各處雖有不能乘肩輿者，然策杖而行，亦不難通過，絕無任何危險。山內寺廟多已重修，食宿較易。近來各僧以遊山之人日多，故日日在改善中。且山口內已設有旅社，黃山建委會邇來亦正在努力建設山中新路，創築住宅區。凡由京滬杭及安慶對面之殷家匯各路來遊，均可朝發夕至。有此種種便利，故遊者踵接。惟黃山尙無實測地形圖，似當速爲測製。他若寺廟食宿，雖已較從前便利，而猶有宜改善之處。又各公路汽車之連絡尙欠完善，如由杭本一日可到湯口，然由杭乘公共汽車而往，則須在徽州住一夜，二日方能到。如由京乘公共汽車而往，則須在蕪湖及徽州各宿一夜，三日方能到（由京至蕪

湖，有江南汽車公司公共汽車，及江南鐵路火車，火車并可通宣城之孫家

埠。蕪湖至屯溪直達車，每晨七時八時開兩班，票價由蕪湖至徽州每人七

元三角五分。應急設法使各公路汽車開行鐘點相銜接。以上

數端，皆與黃山之發達及遊人之便利有莫大之關係也。

廿四，六，六，北平。

對於『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的意見

容肇祖

王重民先生清代學術論文索引一書，據禹貢半月刊編

者謂『已成書，不久可由北平圖書館出版。承其美意，允

將地理一類先由本刊發表』。索引的一種學問，本來是見

目即鈔，只求分類妥當，即為能手。我們深幸王先生的清

代學術論文索引的成書，又甚幸地理論文目錄的先睹。雖

然禹貢登了兩期，還未登完，而我們得益已覺不少。但有

一事，深覺不安於心，這或由於王先生偶爾的疏忽，今敢

貢其意見以求大雅的教正。

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最不易分別朝代的，是為易代

後的遺民：一方固可認作前朝，一方則也可認作後朝。若

其在學術上有大貢獻，則後朝必拉以為重；然而略迹原

心，又確可認作前朝或稱為勝國的遺民。如顧炎武，在清

代皆認之為清人，而我們看他的心則固明朝的遺民。王先

生地理論文目錄列顧炎武的論文，認為清代人，我們從習

慣看來可無異辭；但列現存的羅振玉先生的論文，是又略

迹原心，歸之於清代。似此，於體例上已不明白一致。又

如地理論文目錄中兼收錢謙益，楊守敬之文。錢謙益，在

明官至禮部尚書，降清後官禮部侍郎，固當認為清人；而

楊守敬在清官黃岡教諭，在民國官參政院參政，又認之為

清人乎？又如地理論文目錄兼收梁啟超，章炳麟之文。

梁啟超先生在民國曾為財政部長，而以曾仕於清故歸之於

清；章炳麟先生在清末倡革命，推翻皇室，與有功焉，至

今日尚健存，難道亦不得不為清人乎？如謂章先生之文

係在清代所作，那麼地理目錄收入王國維觀堂集林之文實

皆入民國後所作，又將何辭以解？又如地理目錄中收入陳

漢章先生漢置五屬國考等文，陳先生以民國二年畢業於國

立北京大學史學門，任大學教授至今二十年，竟視為清代

學者而與羅振玉先生一例，無乃太與人以難堪乎？又如劉

師培亦以民國後入國立北京大學任教授，亦強之以為清人

乎？如凡在民國去世者皆謂之清人，則張相文先生南園叢

稿內之論文何一不可收入。如凡在前清生者皆謂之清人，則將來續編『清代學者論文目錄』時，顧頡剛，錢穆先生等論文皆可收入，凡我們一輩皆不幸而為清人矣。似此漫無界限的『清代』名稱，竊以為未安；幸是『清代學術論文索引』一書尚未出，猶可着手改修也。

改修的方法，鄙意約有三種：一，刪去梁啟超，王國維，及現存的章炳麟先生等本應屬於民國的學者的論文目錄；二，如不刪去，改為附錄，附入各類之後，低格以別之；三，改換名稱。關於此事，我記得梁啟超先生曾著『清代學術概論』一書，後來在清華大學又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講義。他說道：『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範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

織狠有些不同』。梁先生的講義，自然上溯至明天啓，下迄民國的十來年。梁先生的改變『清代』為『近三百年』的名稱，似可以給王先生以一種很好的參考。不然，漫不加察，隨便目為清人，使已故及現存的學者為之短氣，使偽國奸宄之徒為之張目，為害真不細了。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日。

編者按：無論作什麼事，最難的是斷限。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聯貫的，本來沒有什麼界畫；但是人們為處理方便起見，不得不硬定出一個界畫來。既係硬定，便有參差，這真是無可奈何的缺憾。我們感激王先生的博求，也佩服容先生的約守。我們希望北平圖書館將來出版本書的時候，肯採用容先生的第三條建議，改題為『近三百年學術論文索引』。

商務印書館

最近印行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皇祐新樂圖記 (經部) 一册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史部) 一册
家山圖書 (子部) 一册 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 (集部) 三册

敝館前承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據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縮成六開本，本年七月全書可以出齊，茲復就經史子集四部中各選其一，曰皇祐新樂圖記，曰紹熙州縣釋奠儀圖，曰家山圖書，曰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凡四種，書版尺寸悉準原式，用本國加料宣紙朱墨兩色套印，粉連史紙觀葉卷首校勘官銜黃色標籤，封面分用四色彩綢包裝，經緯史紅子藍集灰，一如文淵閣藏本原制，而離騷全圖特以珂羅版覆印，尤為精妙，讀者得此，庶可觀四庫全書原本之真面目焉。

全書六大册一函
版式：寬二十公分
 高三十分半
用本國加料宣紙
膠版及珂羅版精印
定價六十元
(如兼購宋錦封套
另加實洋三元五角)